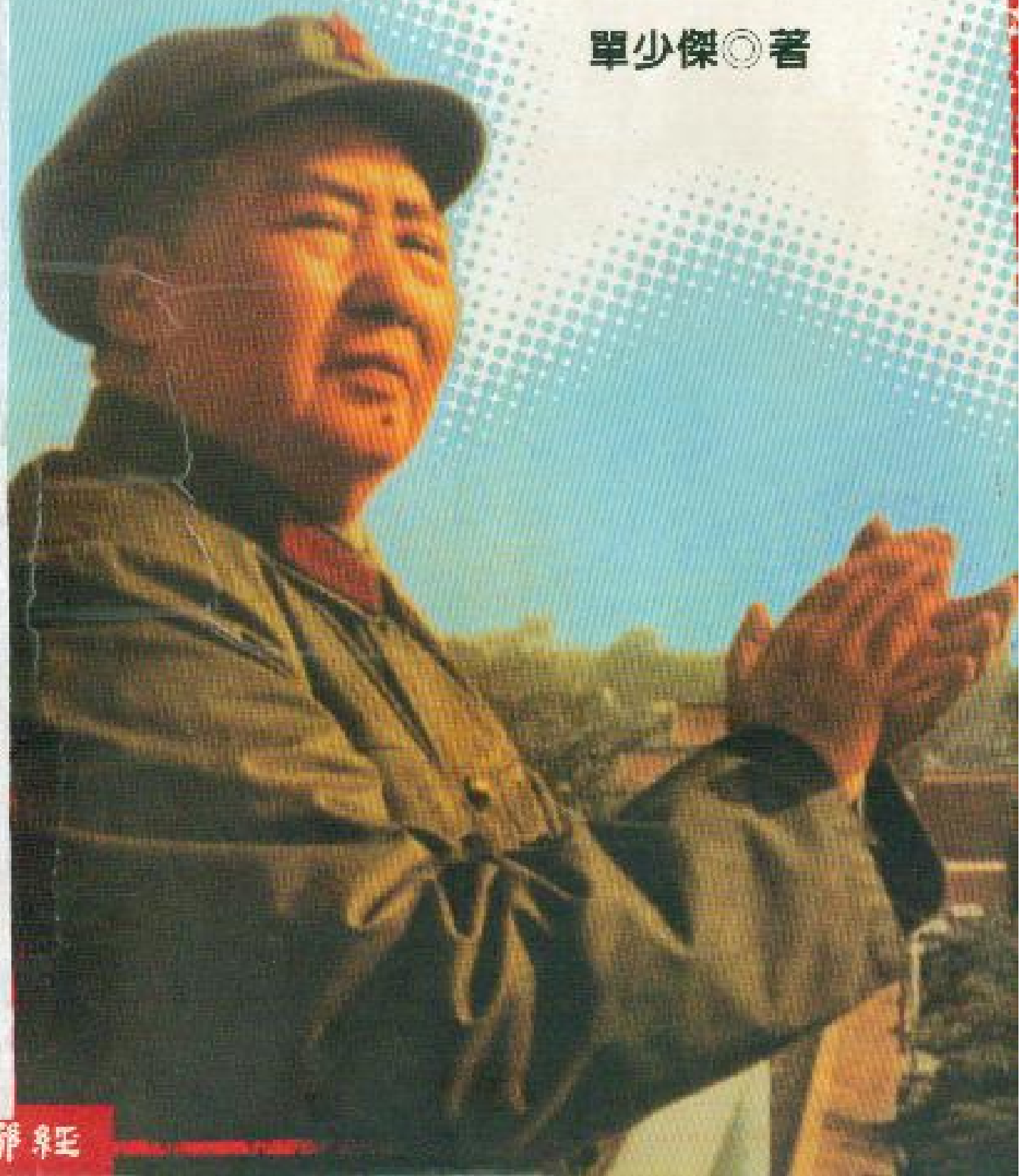


文化叢刊

毛澤東執政春秋

單少傑◎著



聯經

第四篇

革命：四清運動反帝反修文藝批判

引言

1962年，毛澤東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轉折，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為主要搞階級鬥爭，又回到了他能夠發揮自身專長的老本行上。

不過，他此次搞的是一種新的階級鬥爭，鬥的是一批新的階級敵人。是一批老熟人、一批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熟人。他本是農民的兒子，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故對農民最熟悉；他又是念過師範的讀書人，是滿腹經綸的文化人，故又對知識分子最熟悉；他又是職業政治家，是執政黨主席，故又對該黨幹部尤其高級幹部最熟悉。

結果，毛澤東在其執政期間，非但不去好好地安頓這些老熟人，反而使勁地折騰他們，致使他們成了新中國裡最不幸的人。

1962年前，毛雖以搞經濟建設為主，但也沒少折騰他們。

「合作化」運動，剝奪了農民自主經營土地的權利，並使他們中的幾千萬人餓死；「反右派」運動，剝奪了知識分子發表不同政見的權利，並將他們中的數十萬人打成「右派」；「反右傾」運動，剝奪了執政黨幹部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並給他們中的數百萬人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

1962年後，毛轉而大搞政治運動，更是頻頻光顧老熟人。

「四清」運動，重點整農村基層幹部，而這些人過去大都是緊跟執政黨鬧土改搞合作化的農民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運動，既使90%以上的專家學者被揪鬥、被侮稱為「牛鬼蛇神」，又使90%以上的執政黨高幹被衝擊、被指責為「走資派」。

用民間俗話說，老人家是一個「克熟」的人，一個總想著法子來整治熟人的，並且人頭越熟整治得越起勁，甚至寧願寬大那些曾與他不共戴天的「戰犯」，也不肯放過那些曾和他生死與共的「戰友」，並把他們中的一些人囚死在自家獄中。此公無疑把中國人的「窩裡鬥」精神發揚到極致。

或許他在「山溝溝裡」搞馬克思主義搞久了，也養成「山溝溝裡」心態：總願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活動，想找最熟悉的人群打交道，只是打交道的的手法太辣了點。

把國家中樞權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這在二戰前，不可設想在政治體制中出現。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提出在黨內搞民主集中制，這在當時有其進步性，但不過毛澤東搞民主集中制是為了集中權力，對黨內民主只提提口實，實際上毛澤東對黨內民主是採取了極端專制的手段。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提出在黨內搞民主集中制，這在當時有其進步性，但不過毛澤東搞民主集中制是為了集中權力，對黨內民主只提提口實，實際上毛澤東對黨內民主是採取了極端專制的手段。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提出在黨內搞民主集中制，這在當時有其進步性，但不過毛澤東搞民主集中制是為了集中權力，對黨內民主只提提口實，實際上毛澤東對黨內民主是採取了極端專制的手段。

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提出在黨內搞民主集中制，這在當時有其進步性，但不過毛澤東搞民主集中制是為了集中權力，對黨內民主只提提口實，實際上毛澤東對黨內民主是採取了極端專制的手段。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提出在黨內搞民主集中制，這在當時有其進步性，但不過毛澤東搞民主集中制是為了集中權力，對黨內民主只提提口實，實際上毛澤東對黨內民主是採取了極端專制的手段。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就提出在黨內搞民主集中制，這在當時有其進步性，但不過毛澤東搞民主集中制是為了集中權力，對黨內民主只提提口實，實際上毛澤東對黨內民主是採取了極端專制的手段。

① 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路」的方針。

② 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路」的方針。

45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給執政黨出了「要抓階級鬥爭」的題目。會後，毛急於知道他的黨是怎樣來做這個題目的。

1962年冬至1963年初，老人家風塵僕僕地巡視了11個省。結果只有湖南河北兩省的書記與他「滔滔不絕地講社會主義教育」，講階級鬥爭問題，而大多數省的領導都不提此事，都表現出與毛的要求迥然不同的施政傾向¹。

大多數執政黨幹部還不像他，能夠把階級鬥爭看得那麼重要、那麼迫切；既沒有他那樣的警覺性，能夠發現那麼多的階級敵人；也沒有他那樣的靈活性，能夠說轉彎子就轉彎子。大家實在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所以只好會上恭聽教誨，會下另行其事。

大多數執政黨幹部也不像他那樣，能夠身居「二線」坐著專列到處跑，能夠把主要精力放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他們都在現職上，都忙於日常政務，就當時來說都忙於恢復經濟，忙於收拾「大躍進」留下來的爛攤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忙於度荒，忙於讓老百姓有飯吃而不至於被餓死。

毛在人民還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硬要他們大抓階級鬥爭，實是向人民強行推銷他們此時還支付不起的奢侈品。他一向以人民領袖自居，但常把自己關心的事看得重於人民關心的事，並強求人民也像他那樣想問題，做事情。

所謂「毛澤東退居二線」是一種很令人困惑的現象：你說他在「二線」的話，可他常常跑到「一線」的前面甚至前面很遠的地方，致使那些「一線」大員們跑得氣喘吁吁還跟不上；你說他在「一線」的話，可他又常常游離國家政治中心之外，或半年多不回北京，或整天裡翻看一本本線裝書。

1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66。

換作中國老話：你說他是「太上皇」吧，可他常常撇開小皇帝跑上大殿吆三喝四，直接使喚文武朝臣；你說他是「垂帘聽政」吧，可小皇帝背後的帘子裡常常空無一人，不知他老人家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把國家中樞權力分成「一線」和「二線」，可說是毛在政治體制建構上的一項創舉，其宗旨就在於保證他自己既能夠執掌權力又不必過於分心，既能夠享有許多權利又不必承擔相應義務。

這一制度創設，使得創設者本人處於進退自如境地：要想管事了抓起來就能管上，不想管事了丟下來就能走人，想進就進，想退就退，甚至以進為退，以退為進。1963年他年屆七旬，正如孔夫子所言：「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

在國家日常政務之內，他是一個較閒的人。常有這樣的情況：劉少奇、周恩來在北京手忙腳亂，難得片刻安歇，同時還得留意身後有人不時投來灼人的目光；老人家則在南方花團錦簇的別墅中讀書看報，間或著和身旁服務員說說笑話，講講故事，或做做其他事情。

在國家日常政務之外，他又是一個很忙的人。老人家原本就不是一個安於閒適的人，只要有時間有精力，就會有所舉動有所作為。如他自己說的，他之所以退居「二線」，就為的是要騰出空來想一些大事情、一些國家日常政務之外的大事情。

例如，在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期間，這位黨主席比任何人都忙，先是背著黨中央在那裡忙於組織文章，以批判《海瑞罷官》；後又背著黨中央在那裡忙於「調兵遣將」，以防止「反革命政變」。林彪事後披露：「毛主席爲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²

這一制度創設，還使得創設者本人能夠擁有雙重身分：只要願意，就能以在位者身分號令一切；只要不滿，就能以在野者身分評品一切，甚至能像

²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18)〉，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頁17。

反對黨罵執政黨那樣來痛斥「一線」大員，痛斥他們中的許多人已變成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毛澤東這一做法後來為鄧小平繼承。鄧雖在對待經濟建設問題上很不同於毛，並因而給治下人民帶來許多實惠；但在運作政治權力問題上又相似於毛，並因而給中國政治帶來許多弊端，例如，他也搞出了這樣一種局面：

他雖不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卻能掌握黨和國家的最後決定權。

他雖主要靠集體智慧搞改革開放，卻能聽任屬下把這集體智慧歸在他自己名下。無論是昔日的「毛澤東思想」，還是今天的「鄧小平理論」，都是把個人名字寫在集體智慧成果上³。

- 3 當然，在這些集體智慧成果裡，也有屬於毛澤東個人和鄧小平個人的份額，並且，他們個人的份額很可能要大於其他個人的份額；但是，他們個人的份額無論再大，也遠小於其他個人的份額之總和。

例如，在改革開放過程中：

意義最重大的思想交鋒，即真理問題討論，是胡耀邦等人發起的；

意義最重大的制度創新，即土地聯產責任承包制，是中國老農民搞出的（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什麼人都想占農民的便宜）；

色彩最多樣的新生事物，即經濟特區，是任仲夷等人最先提議建立的；

……

今天一談起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有人繪聲繪色地說：有一個老人在南中國海邊畫了「幾個圈圈」，……，可是，很少有人會接著談到這個老人是怎麼想起來要畫那「幾個圈圈」的，很少有人會接著強調任仲夷等人的創議權。

如此宣傳個人，表面上是宣傳者在為被宣傳者歌功頌德，實質上是宣傳者在陷被宣傳者於不義的境地，即致使被宣傳者有著個人獨享大家榮譽的嫌疑。人們也正因此而可以說，宣傳者是在有意無意地謀害被宣傳者（僅就歷史維度而言）。

人們可以稍稍思索一下，毛的黨在毛死後宣佈「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成果」這一說法究竟意味著什麼？

人們不難想出，這一說法至少意味著兩點：

其一，毛澤東生前把集體東西據為己有，可謂「侵吞」；

他雖被稱作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卻能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失誤不承擔責任，不下「罪己詔」。權力是自己的，過失是別人的。

他雖定了黨和國家的重大人選，將他當時還看得順眼的一些人推上台去，但後來又屢屢撤他們的職。毛澤東曾換過3個接班人：劉少奇、林彪、華國鋒。鄧小平也換了3個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

無論是毛還是鄧，在權力運作上都是自我中心主義者，都力圖使自己在黨和國家的權力架構中處於一種最佳的位置：能夠擁有最大的權力，卻不需要承擔最大的責任，不需要親臨實際工作，不需要作出深刻反省，甚至不需要口齒清楚地說出一些話、一些讓別人能聽得很明白的話。

數年前，筆者曾聽一位中共老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在鄧的身上有許多毛的陰影。」說話者德高望重，所談者入木三分。

不過，人們仍懷有希望：雖然鄧小平擺脫不了毛澤東的政治陰影，但未來中國將會擺脫鄧小平的政治陰影，將會根除這種任由最高統治者或為「一線」或為「二線」、或換馬張三或換馬李四、十分怪異的權力運作體制。

其二，毛的黨把毛曾經據為己有的集體東西歸還集體所有，可謂「清退」。

再打個比方：

毛活著時，大家總往他的口袋裡塞東西，總說這裡面都是屬於您老人家的東西；毛死了後，大家又從他的口袋裡掏東西，又說這裡面還有屬於我們大家的東西。在這裡，毛不光彩，大家也不光彩：一是害毛，二是勢利，三是送人東西出而反而。

在宣傳個人方面，我們已有過一次沉重教訓，一次令宣傳者和被宣傳者以及整個中國大陸民眾都極為難看故而堪稱國恥的教訓，如今還這麼幹，不能不讓世人嘲笑我們這個民族太健忘了、太沒有記性了。

盧梭說，文明人優越於野蠻人的地方就在於擁有記憶力；

有人說，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

筆者說，21世紀將是文明人的世紀，中國人若要擁有21世紀，就應該擁有記憶力，尤其應該擁有對自己在20世紀所作所為的記憶力。

1963年初，毛澤東在巡視了11省後回到北京。

巡視結果使他頗感失望，因為大部分一線工作都沒有按照他這位二線人物的要求去做，沒有去抓階級鬥爭。或者說，大部分場上隊員都沒有按照他這位場外教練的意圖去踢球，沒有去踢別人膝蓋。

這對於他來說是難以容忍的。他把自己置於二線位置，並不真要扮演二線角色，而只是要擺脫一線的日常事務，以便更好地把握一線的大政方針。他如今發現「一線」工作偏離了既定的目標，有悖於他的意圖，於是決定出面干預。或者說，場外教練觀球觀到上火時忍不住也要下場踢它一通。這就有了二月中央工作會議(1963.2.11-18)的召開。

在此會上，毛一再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並介紹了湖南河北兩省搞社會主義教育的經驗。湖南經驗講的是如何糾正「單幹風」、如何打擊「牛鬼蛇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河北經驗講的是如何開展「四清工作」(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

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在農村開始「四清」運動試點工作。

無論城市裡的「五反」，還是農村中的「四清」，最初都從經濟問題入手，前者主要反經濟犯罪，後者主要清財務問題；最後都落實到政治問題上，「都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¹ 從這裡可看出，毛是如何在經濟與政治之間搭橋的。

1 毛澤東，〈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1963.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71-83。

二月會議對城市裡的「社教」運動作了明確規定，發了內容詳盡的〈五反指示〉；但對農村裡的「社教」運動只談了一些原則性問題，而沒有作出具體規定，沒有形成有關如何開展此項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毛澤東本是對農村問題的了解比對城市問題的了解要多得多，理應能夠較快地拿出具體辦法來，結果相反，處理前者比處理後者要遲緩得多。

這表明毛此時在如何開展農村社教問題上是較為慎重的。他或許是考慮到當時農村經濟還未恢復，尤其二月過後正趕上農業青黃不接季節，故不宜搞較大的政治運動；或許是已將廣大農村地區預設為搞社教運動的主戰場，故還應做更多的調查研究。

這也預示毛將向農村社教運動投入更多的精力。他還要在中央開更多的會議，並作出更多的決定；還要對「一線」大員作更多的訓示，並因此而發生更多的衝突。

二月會議後，毛著重研究農村「社教」問題，讀了大量材料，做了許多批示，並主持召開由各大區書記和部分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杭州會議（5月2日-12日），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又稱〈前十條〉。這是有關農村社教運動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在此期間，毛繼續強調社教運動的必要性。他非常嚴肅地告訴其黨人，如果不按照他說的去，就將會出現這樣一種災難性後果：

「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²

2 國防大學編，〈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

不過，在如何將有關農村社教決定付諸實施這一問題上，毛仍主張要慢慢來。

關於實施步驟問題，毛一再強調要經過試點階段，要分期、分批、分地區地逐步推開。

「要踏踏實實地搞深搞透」，「不要著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後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嗎？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責備他。你一圍攻，他一著急，就亂來。要慢慢地說服。著什麼急？我們革命勝利比蘇聯還不是晚卅多年？」³

關於處理人問題，毛也反覆強調要團結95%以上的人，「沒有螞蟻的地方不要硬找螞蟻」，不要傷人過多。

對於多數群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還要加上不迫不逼，不打不罵」。

對於犯錯誤者，只要他們悔改，就給以機會，洗手洗澡，主要洗「溫水澡」，批評要用事實材料，退賠要合情合理，「懲辦要控制在1%」⁴。

據薄一波記述⁵，杭州會議結束前夕，毛澤東仍放心不下，一夜未睡，凌晨時將各大區書記召來，再三叮囑，不要傷人過多。

從毛的這番謹慎中，既可看出他的問題來，即對自己信誓旦旦要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也可看出他的經驗來，即在一場前景未明的角逐中，首先設法保住自己不至於發生潰敗的底線，即把盡可能多的人拉到自己這一邊來。

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212。

3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68-71。

4 毛澤東，〈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1963.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71-83。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68-71。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09。

正如毛擔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進入試點階段，就出現「階級鬥爭」過火情況，許多地區接二連三地發生打人、捆人、甚至整死人的事件。

當年九月，中共中央又開工作會議，著重討論農村「社教」運動搞得過火問題，制定應對政策，最後形成…〈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又稱〈後十條〉。

與〈前十條〉相比，〈後十條〉有兩個特點：

其一，它不是由毛本人主持制定的，而是先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討論、繼由田家英執筆、後由劉少奇主持通過的。毛後來嘲諷道：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出第一個10條，爲什麼剛過了3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個十條，只有3個月，有那麼多經驗⁶？！儘管他當時也同意將此件向所有人宣讀，包括向地、富、反、壞、右分子宣讀⁷。

其二，〈後十條〉更強調要團結95%以上的群眾和95%以上的幹部，要擴大團結面，縮小打擊面，要對落後群眾和地富子女予以教育，不能按階級敵人來對待，要對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予以幫助，不能搞取而代之，批評從嚴，處理從寬。相對於〈前十條〉來說，〈後十條〉更趨於緩和、更注意反「左」。

可是，〈後十條〉一經實施，不但沒有使運動過火情況有所緩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反「左」的結果，越反越「左」。「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試點舖開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一地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⁸ 這個搞階級鬥爭起家的黨，不鬥則已，一鬥則火。

就運動決策層面看，一些領導人作出許多強化階級鬥爭的判斷與部署。

6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604。

7 國防大學編，〈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1963.11.14)〉，《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341。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14-1115。

劉少奇爲「一線」首席大員，統一領導全國「四清」運動。他認爲，農村幹部的實際狀況比原先估計要嚴重得多，因此〈後十條〉關於團結95%以上幹部的規定不妥當，要修改。他提出，對於農村幹部，可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依靠的就不依靠，不必受限於那個百分比；即使是可依靠的，開始也不能依靠，等問題摸清後才能依靠。

劉還認爲，犯錯誤的基層幹部，在上面大都有根子、大都有一些領導幹部給他們撐腰；因此，「四清」運動在清查下面的同時，還要追查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⁹

另外，他還主張擴大「四清」範圍，不只是清經濟，還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所有遇到的問題。他還提出所謂「打殲滅戰」方式，即一次派出數千人乃至上萬人的工作隊，集中去搞一個縣的「四清」運動，以便能搞得深、搞得透。

對於劉的這些判斷與搞法，毛當時是贊成的，是同意將階級鬥爭形勢看得十分嚴峻的。他本人就多次談到，我們這個國家有1/3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而掌握在敵人手裡。他對劉建議的「打殲滅戰」方式，也「覺得很好、完全贊成」，儘管他半年後又反過來說這是搞「人海戰術」¹⁰。

就運動實施層面看，一些地方以及一些工作隊，也不斷提供許多大講階級鬥爭的「典型」材料。其中，最「典型」者要數這三個材料：

一是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提供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報告稱，工作隊通過調查發現：「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已篡奪了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大權，將這一「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聯合企業」，「變成爲地主、資產階級集團統治的獨立王國」，其間，營

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37。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19頁、1132。

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成風，領導生活腐化，社會風尚敗壞，反革命活動猖獗。報告又稱，工作隊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動群眾，進行奪權鬥爭，處分原黨委書記等人，終使公司領導權又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中共中央肯定了這個報告，並將它批轉全國各地區各部門。中央批轉通知稱：這個事件「最根本的教訓就是，在我們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硬是忘記和忽視了社會上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一客觀事實」；與此相應，這個事件最重要的經驗就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必須組織好革命的階級隊伍，建立階級檔案；徹底清除壞人，挖掉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修正主義的根子，決不可以放任自流，半途而廢。」¹¹

二是天津市委提供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報告稱，「四清」運動前，小站地區的天下還不是我們的或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我們的，這裡的政權已被三個反革命集團所操縱，這些反革命集團有上面的根子，得到南郊區委以及本公社一些領導人的支持。

報告還提供了一條為中央完全肯定的經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是從『四清』入手，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清不出什麼來。後來轉入奪權的政治鬥爭，並處分了區委和公社的一些領導人，才打開了局面，充分發動了群眾，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

中共中央在轉發這個報告時，強調指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鬥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¹²

三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提供的〈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

11 國防大學編，〈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1964.6.23)〉，《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434-435。

12 國防大學編，〈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1964.10.24)〉，《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508。

驗總結〉，又稱「桃園經驗」。這是劉親自抓的一個「典型」，較完整地體現了他搞「四清」運動的意圖。他就此向毛作了報告，獲其肯定；並代中央起草了向全國轉發這個報告的批示，稱該報告「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致的典型經驗總結。」¹³

按王光美說法¹⁴，她最初是帶著少奇同志給的兩個思想方法下去的：一是「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二是「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王說，當時覺著他講得很原則，但經過幾個月實踐，「越琢磨越覺得這幾句話重要」。

王所在的四清工作隊進村不久，便避開桃園大隊幹部而搞起「紮根串連」，私下裡找「根子」談話，背地裡開「根子」會議，會間還派人放哨，以防有人偷聽。通過這種秘密發動工作，終於在工作隊周圍組織起一支屬於自己的「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王還以此證明，「社教」運動初期所強調的「一切經過基層組織」的規定是錯誤的。

通過清理經濟問題和開展階級鬥爭，王的工作隊終於發現，中共桃園大隊支部書記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是一個「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辦著國民黨的事」的「國民黨分子」。他所把持的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的，他所把持的政權「基本上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可是，直到工作隊走時，「還沒查出他和國民黨有組織聯繫」。不過，「我們沒查出來，並不等於就沒有這種可能性」。

王的工作隊還發現，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大都不僅有下面的「根子」即地、富、反、壞、右分子，而且有上面的「根子」即他們在公

13 國防大學編，〈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1964.9.1)〉，《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471-472。

14 王光美，〈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1964.7.5)〉，《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社裡、區裡、縣裡的「靠山」。

在報告末尾，王談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矛盾的焦點在哪裡」這一問題。她認為，「焦點」就在「和平演變」上，即一些階級敵人「鑽進革命隊伍，用各種各樣的形式，潛移默化，使我們的一些幹部，舒舒服服地演變過去了，代表了敵人的利益。」她還帶著感情說道，無產階級在掌握了政權後如何不被「和平演變」這一問題，在世界上還沒有解決，但我們黨決心通過再搞社會主義革命來予以解決，這個革命「是史無前例的！」

不久之後，這位王女士就真的看到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一場「史無前例」地把她自己以及她丈夫深捲進去的革命。

47

1964年，是「四清」運動全面鋪開且不斷加溫的一年，也是中央高層出現矛盾且頻頻開會的一年。這一年，中共中央開了三次工作會議，次次都議論「四清」運動，並且都作出重要決定。

5月中旬至6月中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已明顯「左」轉，提出許多與〈後十條〉精神不一致的激進主張，從而促使中央書記處作出修改〈後十條〉的決定。

9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1964.9.10)，並於9月18日印發全國「四清」工作隊，授權它們全面領導運動，即可以撇開所在地方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來搞運動，結果使得運動更加「左傾」化，使得許多農村基層幹部遭受更爲激烈的衝擊，被鬥、被打、被強令退賠。有的縣自殺了數十人，有的幹部退賠掉全部家當，只剩下身上一條褲、床上一片席。

12月15日至來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開始調整「四清」方向，一方面批評運動搞法「左傾」化，另一方面又強調階級鬥爭嚴峻性。在此會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指責他在運動中犯了「形左實右」錯誤。會議討論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5.1.14)〉，又稱〈二十三條〉。

在上述三次會議中，第三次最重要。它是毛澤東執政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一個有著多重意義的轉折點：

- 一、「四清」運動本身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即由主要清理「四不清幹部」到主要整治「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轉折點；

二、是毛澤東與劉少奇政治關係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即由可與重托到決意除去的轉折點；

三、毛澤東執政角色變換中的一個轉折點，即由退居「二線」到重返「一線」的轉折點。

據薄一波記述¹，毛對劉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上：一是關於運動性質問題，二是關於運動搞法問題。

關於第一點。劉認為，這場運動的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質按毛的說法是由其主要矛盾決定的——是「四清」與「四不清」矛盾，並且是黨內矛盾與黨外矛盾相交織、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相交織。

毛不同意劉的這一說法，認為它沒有說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特有性質。因為，從字面上看，所謂「四清」與「四不清」說法，什麼樣的社會都可以用；所謂黨內外矛盾相交叉說法，什麼樣的黨派都可以用；所謂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相交叉說法，什麼樣的歷史時期都可以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在毛看來，這場運動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這一判斷符合本黨自七屆二中全會以來的一貫說法。他反覆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還將他與劉的這一份歧寫進〈二十三條〉中²。這是以中央文件形式給劉掛了一筆帳，留待日後清算。

關於第二點。毛澤東無論在會議即席講話中，還是在他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中，都對劉少奇如何搞運動的方式提出尖銳批評：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28-1136。

² 國防大學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3.1.14)》，《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558-565。

針對後者所贊成的「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的主張，前者指出，要「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

針對後者所認可的「紮根串連」的搞法，前者指出，「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數人當中活動」；

針對後者所作出的「打殲滅戰」的部署，前者提出，不要搞「人海戰術」，「不要在一個縣、社、隊集中人數過多的工作隊」；

針對後者所領導的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的情況，前者提出，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畫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是20%，那7億人就是1億4，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此次毛對劉的批評是很意氣用事的，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乃至戲劇性色彩。

12月28日，老人家拿著《憲法》和《黨章》走進會場，滿腹怨憤地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事情起因：在會議召開前，鄧小平曾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到會；在會議進行中，劉少奇又說，情況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於是，毛澤東氣得說，一個不叫我參加會議，一個不叫我講話。

當老人家向別人出示《憲法》和《黨章》時，不知他可想到別人也可以向他出示《憲法》和《黨章》，要求他能夠依法循章地行使權力。這裡的「別人」，不僅包括「地富反壞右」，而且包括普通老百姓，以及像彭德懷、劉少奇那樣的執政黨高幹。

一個向來都在《憲法》和《黨章》之上說話和行事的人，此次竟也在那裡尋求《憲法》和《黨章》的保護。不知當時在場者是怎樣想的，但就後人看來是不倫不類的，其喊冤叫屈無異於胡攪蠻纏，還有些滑稽。

一個向來喜歡打赤膊、光脊樑的人，突然穿起了西服、繫上了領帶；可是，西服裡面沒穿襯衣，領帶繫在光脖子上。

上述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兩方面批評，後來又在毛的那張「大字報」中被提出來，被十分簡約地概括為五個字：「形『左』而實右」¹。其「形『左』」，指劉在運動的搞法上犯了擴大化錯誤；其「實右」，指劉在對運動基本性質的判定上犯了立場性錯誤。

我們在此主要興趣，不是想判定劉是不是像毛所批評的那樣犯了這些或為「左」或為「右」的錯誤，而是想知道劉為什麼會有這些或被稱為「左」或被稱為「右」的表現，以及毛為什麼會作出那些或為嚴辭厲語或為冷嘲熱諷的批評。

劉少奇所領導的運動之所以整出那麼多的「四不清」幹部，有許多方面原因，其中主要原因出在體制方面。

其一，從這個權力體制的內在結構上看，毛的國家屬於一黨專政的國家，其間各級權力機構都實行所謂一元化領導，每一權力機構除了受上級權力機構的領導外，幾乎不受其他任何方面的制約。

這種垂直性領導方式，難以保證上級權力機構對下屬權力機構實行有效監督。一是因為，它與下屬機構處於一種一對多的關係，故存在照應不全的情況。二是因為，它對下屬機構的了解多是依據下屬機構自己提供的信息，故難獲得較為客觀的資訊。

與此相應，它的下屬權力機構就很可能會無所顧忌而放任自流起來。其中，農村基層組織情況尤為嚴重。

由於處在這個國家社會發展水平階梯的最低層面上，中共農村基層幹部

1 毛澤東，〈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頁70。

所受到的制約也最少，也最容易規避。不僅上級對他們的有效監控手段不足，而且他們本身的自我約束能力也較差，同時治下群眾的主動參政意識也很弱。

這些因素使得他們中許多人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很容易獨斷行事，既不好好遵循上級指示，也不好好尊重下面民情，長此以往，沒有不濫用權力的，小到多吃多占，大到打人罵人。其中極端者，幾乎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為官一地，稱霸一方。勿庸置疑，在新中國廣大農村中，有著許多形形色色的土皇帝，有著許多大大小小的毛澤東。

這種情況對於中共高層來說，不整不知道，一整嚇一跳，似乎到處都是「四不清」的人和事。用毛澤東的話說，走起路來看不到螞蟻，彎下腰來則看到很多螞蟻²。

因此，不是劉少奇個人想整出那麼多的「四不清」幹部，而是這個體制本身就造出那麼多的「四不清」幹部。

其二，從這個權力體制的運作方式上看，不論劉少奇在前台或毛澤東在前台，若要想有效整肅吏治，就不得不搞「群眾運動」。

任何政權中的高層領導人，都不希望下屬官吏過於貪污腐化、過於魚肉百姓；即使他們自己愛搞腐敗，也不希望下屬跟著他們做這同樣事情。道理很簡單，如果下屬官吏過於腐敗，那麼，他們就會：一是占有大量資源，從而過多地截取原是流向國庫或流向高層官吏的利益；二是激起民怨民憤，從而不利於自家政權的穩定。

這種整治吏治的要求，在中共政權中表現得尤為強烈。一是因其執政黨當初就是打著鏟除貪官污吏的旗號來奪取政權的，故很想獲有為政清廉的名分，以顯示其「不忘本」。二是因其政權所受到的外部制約力與內部制約力都有限，並不斷弱化，故使得治下腐敗現象很容易滋生，並愈演愈烈。因

2 毛澤東，〈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80。

此，中共領導人不論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都是真心想整治吏治清除腐敗的。

可是，中共領導人只要著手整肅吏治，就會遭遇體制性困境。

他們若想有效整肅吏治，就必須做到兩點：一是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吏治實況，了解下屬官吏究竟怎樣搞腐敗的事實；二是要有所觸痛地教訓犯錯誤者，以使他們中的多數人不敢重蹈覆轍。

可是，中共權力體制本身，不能為做到這兩點而提供有效途徑。這個權力運作體制，如就行業領導系統看，大多是雙重的，即部門與地區、「條」與「塊」相交叉；如就政治領導系統即人們常說的黨委領導系統看，又都是一元化的。比較而言，後者更為根本些，因為這個國家說到底是一個「黨國」，是一個一黨專政或以黨代政的國家。

在這種體制下，各級權力機構，對上，接受一元化領導，接受單一主管黨委垂直領導；對下，實行一元化領導，壟斷屬下一切事權乃至人權；而在其左右，不存在其他真正能與之相互平行並對之進行制約的權力機構。

於是，在這上下級權力機構之間，形成一種單一渠道的全依全靠的關係，不僅下級機構在受權方面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單一上級主管黨委，而且上級機構在施權方面也只能完全依靠它的各個下屬分支機構，而不能通過其他途徑對它們進行監督。

在一般情況下，上級機構只能通過下級機構自己提供的信息來了解它們的政績。這可以說是上級機構了解下情的正常途徑。然而，這種正常途徑只能提供下級機構自己願意提供的東西，其間難免或作擴大、或作縮小、或無中生有、或隱而不報。

顯然，當上級機構想要了解下屬機構的實情時，即不僅要了解下級比較願意讓上級了解的那些東西、而且要了解下級存心不想讓上級了解的那些東西時，就不能只依靠這種正常途徑，而必須再尋找一些非正常途徑。

這非正常途徑通常有兩條：一是鼓勵下面人越過其上級機構而直接向其領導的領導打小報告，署名匿名都行；二是派出工作隊越過其下級機構而直接到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上司情況，好話壞話都聽。

兩相比較，後一途徑更有效些，所了解到的情況更客觀些，但其成本——無論是經濟成本還是政治成本——也都更高些，因為這已是在搞「運動」了。

在工作隊剛下到基層時，多數群眾是有所疑慮的。因為，工作隊要他們揭發的對象，過去是一直管著他們的人、一直對他們大耍威風的人，並且，將來很可能是繼續管著他們的人、繼續對他們頤指氣使的人。老百姓的心中不僅有來自以往的後怕，而且有對於日後的顧忌。

這後一方面的擔心尤顯沉重。因為工作隊總是要走的，總是要回到城裡去的。如果此時那些被群眾揭發過而又未被打倒的幹部回過頭來搞報復，那麼，群眾怎麼辦？再去找工作隊？怕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了。

為了解決基層群眾對工作隊的認同問題，後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有兩項：

一是避開本地幹部搞發動群眾，也就是搞所謂「紮根串連」。先是背地裡尋找出一些比較敢說話的人——任何地方都有一些相對說來膽子較大的人——作為「根子」；繼而把他們組織起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而後讓他們再去帶動其他群眾一起來訴說那些幹部們的種種不是。

二是為了進一步打消群眾顧慮而設法貶損本地幹部權威，或有意冷落他們，或公開批評他們。這就使得群眾覺著這些幹部沒有什麼人能夠保他們了，甚至使群眾覺著他們中一些人肯定會在運動中被趕下台，故而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結果什麼樣的話都敢說了，無論是這些幹部的確做錯的事，還是自己心中一直記恨的事，都一股腦地說出來了。其中一些膽大好鬥者仗著有工作隊給撐腰，竟對那些挨整幹部又打又罵起來了。於是，整個運動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打擊幅度過寬以及處理方式過嚴的勢頭。

因此，並不是劉少奇、王光美他們個人想當然地要搞「紮根串連」、要搞過火鬥爭，而是他們若要在這個權力體制內整肅吏治就必須採取這些嚴厲措施。正如在鞋匠鋪裡做活就必須用錐子、錘子、鉗子和刀子。

運動到此，還未結束，還有一個如何收場問題。

從歷史上看，中共搞自身整肅運動向來都是：前期刮台風，後期毛毛雨，

先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搞甄別平反，重新起用。運動一來，打倒一片；運動臨近結束時，黨組織又出來扶起滿地趴著的人，說聲「委曲了」，接著宣布被整者中的多數人沒有多大問題或根本沒有問題，並希望他們不計前嫌、放下包袱，繼續為黨工作。

不計前嫌，說是容易，做就難了。這些被整治的幹部，尤其是被過分整治的幹部，大都滿腹怨恨，一旦官復原職就會尋機報復那些整人者，讓他們8寸的腳穿上7寸的鞋。另一方面，那些後來果然被穿上小鞋者，也會耿耿於懷，若無運動則罷，若有運動恐怕又要磨拳擦掌了。

如此搞運動，並是接二連三地如此搞運動(用毛的話說，「七八年又來一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的全面緊張，破壞了我們民族的親和力，並影響深遠。

另外，在那些被重新起用的幹部中，有一些人過去挨整確屬冤案，但也有一些人過去挨整不能說是冤案。後者確實有嚴重錯誤，甚至有很大民憤，本應被清除出領導崗位，但在運動後期落實政策大潮中又被請了回來，繼續做他那個不稱職的官。這後一種人的官復原職，實為吏治中的「廢物再用」，後果可想而知。

這種「廢物再用」已成為這個國家裡的一種常見現象，搞運動時有，不搞運動時也有，此一行業中有，彼一行業中也有。

比如，掌管國有財物的人卻貪污盜竊，負責選拔幹部的人卻任人唯親，從事道德教育的人卻說歸說做歸做，經管大眾媒體的人卻熱衷於做「假大空」節目，當第一把手的人卻言而無信、朝令夕改……。

這些人所犯錯誤，不是一般錯誤，而是那種完全有悖自己的行業規範和職業道德的錯誤，即類似那種執法者犯法的錯誤，是對他們所應承擔的社會角色的根本否定。因此，這類人理應被他們所在行業宣布為永不錄用的人，宣布為本行業決意剔除的人才廢品。即使社會還想對他們有所使用的話，那也應是在他們被調離出該行業之後的事。

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執政黨在處理這些犯錯誤幹部時，常常採取原行

業原崗位消化的方式。例如，貪污犯在被教育了一番後，繼續做他的經濟工作；假道學者在交上了什麼我的反思或我的反省之類的檢查後，繼續做他的思想導師工作；搞糟了甲地工作的某某書記在與上級領導談過話後又被調到乙地工作，繼續發號施令、為害他方；……。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還是出在體制上，出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上。

這個體制常常使執政黨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難以有效監督體制內的官吏，從而導致貪官污吏叢生；另一方面，難以充分吸納體制外的健康力量——根本不允許其生存發展——以替代體制內的那些本該被淘汰出局的劣質官員；結果只能在體制內搞「廢物再用」，即不斷地使用劣質官員，包括使用已查出有腐敗行跡的劣質官員。

這好比是，在得不到淨水補充的情況下，只能搞廢水循環使用，結果越用越髒，越髒越用，甚至越往要害處用，用到了今天，竟用出了貪污犯當上反貪局局長這等怪事。

概言之，搞「四清」運動這一方式，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前述執政黨整肅吏治所要滿足的兩項要求，即了解基層實情和嚴整基層組織；但其本身畢竟是一種非正常的途徑、即以非體制手段來整治體制本身的途徑，並且是一種成本高昂的途徑，即留下許多後遺症的途徑。這如同爲了治病而服用過量抗生素一樣，雖能獲得一些療效，但也抑制身內白血球生長、並使身內病原體獲得一定抗藥性，結果更難治好病。

「四清」運動的這些特點後來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顯現出來，以致於我們有理由說：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大意義，不過是爲接踵而來的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作了某種預演或示範。

最明顯者，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模式，並不都是原創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自於劉王氏的「桃園經驗」，並在更大範圍上運用了這一經驗。

王光美和她的工作隊一進駐桃園大隊，就繞開基層組織，直接到群眾中去找「根子」，並把他們組織起來，以帶動廣大社員去鬥爭那些「四不清」幹部，再順藤摸瓜找出他們在公社裡、區裡和縣裡的「黑後台」。

毛澤東也是按「紮根串連」這一模式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他先是繞開北京到上海搞，找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做「根子」，支持他們寫文章，以掀起文化領域裡的批判運動；繼又背著中央在全國搞，找了許多「紅衛兵」小將做「根子」，鼓勵他們大鳴、大放、大串連，以發動億萬群眾去揪鬥各行各業裡的「走資派」，再一級一級往上揪，一直揪到中央裡，揪出「正睡在」他身邊的那位「中國式的赫魯雪夫」。老人家竟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個「桃園大隊」，並使他自己做了一回「工作隊隊長」。

在中共歷史上，劉少奇最早號召人們學習毛澤東的思想，可此次，毛澤東也反過來學習劉少奇的思想，包括學習他夫人的思想，很是謙虛。據王光美回憶，她每次從桃園大隊回京，毛都要找她了解情況；她的「桃園經驗」報告出來後，毛看了很欣賞，並推薦給江青看，還多次表揚她，還鼓勵她到各地去講一講³。

毛此次之所以學習或模仿劉及其夫人的經驗，不是因為他不及後者高明，而是因為他與後者都受困於相同的權力體制。不論劉少奇還是毛澤東，若想有效整肅這種一元化權力體制下的官吏，若想切實了解他們為政的詳情、打下他們做官的威風，都必須採取這種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

劉少奇由於身居「一線」，具體領導「四清」運動，故先遭遇這一體制性困境、並因此而先採取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故為後來者做了先導性示範。

毛澤東後來重返「一線」，決意發動「文化大革命」，也遭遇這一體制性困境。他很想整治那些已經不大聽話的下屬官吏，尤其想整治那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主席；可是，後者正掌握著或正參與掌握著中共權力體制；因此，要扳倒他，就不得不使用由此人自己摸索出來的那個方法來反對此人，就不得不「請君入甕」。

從這裡可看出體制對於人的力量。體制雖由人創設，但一經創設出來便具有能夠左右人的力量。不論是老百姓，還是執政者，都不能輕易地規避它。

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37、541。

從這裡，還可看出這種一元化權力體制若不作出重大改革便不能擺脫它的兩難處境：要麼不可遏制地腐敗下去，直至完全爛透而亡；要麼三番五次地搞群眾運動，直至過度折騰而亡。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之所以嚴辭責難劉少奇，之所以憤然推翻由後者主持制定並已下發各地的〈十七條〉¹而由自己另起爐灶搞出〈二十三條〉；按前述薄一波觀點，這主要是因為老人家一是不能容忍劉關於「四清」運動主要矛盾的說法，二是不能容忍劉引導「四清」運動嚴整基層的搞法，認為劉「形『左』而實右」。

若進一步追問，毛澤東為什麼不能容忍劉少奇的這種說法和這種搞法？薄一波則語焉不詳。

當毛說「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時，劉則把它說成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這兩種說法確有本質區別：

按照前者，「四清」是一場有著特定內涵的階級鬥爭運動；

按照後者，「四清」是一場僅有一般性質的廉政建設運動，即以清官標準（「四清」）來整肅非清官（「四不清」）運動。

這裡的非清官，並不特指一定歷史時期才會有的資產階級分子，而可泛指任何歷史時期都會有的貪官污吏。至於那種由上面派工作隊直下基層整治四不清幹部的做法，很像是中國老戲裡常演的那種朝廷欽差大臣直下州縣緝拿貪賊枉法者的劇情。

所以，陳伯達說：「所謂清不清，歷代都有這個問題，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²

1 所謂〈十七條〉，即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前期的一個討論紀要，曾於1964年12月28日下發各地；後因毛澤東不滿而於12月31日被停發，並由各地自行銷毀。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33。

薄一波後來抱怨陳伯達在毛劉衝突中起了不良作用，說了不該說的話。

不過，就陳話本身來看，還是說得相當準確的。它確實抓住了劉上述說法的關節點，即用一般所指來替代毛的特殊所指，用那種任何社會都會有的吏治問題，來替代毛所說的那種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才會有的階級鬥爭問題。

這對於毛來說，顯然是另搞一套，至少是淡化他早在1962年就為執政黨制定好的那條「繼續革命路線」。

陳伯達為黨中秀才，雖非忠厚，但有觀察力，不僅能觀察一些大人物的臉色，而且能觀察一些大問題的事理。與此相應，他的老上司毛澤東也是不僅欣賞他的俯首之態，而且欣賞他的理論才幹，欣賞他能夠根據需要找出種種論據來。此次毛就十分欣賞他的上述說法，並將之寫進〈二十三條〉中的第二條裡。

又當毛澤東大談黨內階級鬥爭時，劉少奇卻說情況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³ 劉這些話惹得毛大怒，說劉存心不讓他說話，接下來便上演了那幕拿著《憲法》和《黨章》走進會場的鬧劇。

人們會問，劉這些似是平常的話何以能激怒毛，氣得他如此失態。這裡面有毛自身的因素——已經養成了一觸即跳的性格；也有劉說話分量重的因素——的確觸到了毛的痛處。

所謂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這是劉仍在堅持他關於「四清」運動主要矛盾的說法。因為，只有在「四清」與「四不清」之間，才會既有敵我矛盾又有非敵我矛盾——人們很難將那些多吃一點多占一點的人都說成是敵對分子；而在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就只有敵我矛盾可言了。

所謂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一切從實際從發，這原本是毛一貫自我標榜的思想路線，如今卻被劉用來反駁毛本人，自是令他不快。更要害的是，

³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603-604。

劉的這些話暗示著毛的階級鬥爭理論只具有演繹性質：不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實際中有什麼反映什麼；而是從概念出發，從某種假設出發，預先制定一個理論框子，然後拿去套用現實。

實際上，毛所搞的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都帶有這種演繹性質。如前文所述，他的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是一個假設出來的資本主義，他的社會主義的歸宿點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兩者都屬想當然的東西（參見本書第37、38節）。

毛的後繼者鄧小平就承認，執政黨幹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結果卻不知道究竟什麼才是社會主義。即是說，毛及其黨人幾十年來搞的是一個假設上的社會主義、一個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一個實際所是的社會主義。可問題是，毛爲了這個假設上的社會主義而動用了現實中的不計其數的社會資源，從而造成了我們這個本來就十分貧窮的民族在人力與物力上的巨大浪費，以致不堪承受。

一些文獻在談到毛與劉這一衝突時，多說是毛先發難的。這只是看到表面，只是看到在此衝突中，脾氣數毛發得大，話也數他說得多。若從事理上看，應說是劉先挑戰的。因爲，早先毛已經爲執政黨確立了大政方針，如今劉卻在那裡另說一套，並說得含骨帶刺。毛若想堅持其政治路線，若想維護其政治權威，就必須起而反駁劉。

一向自謙爲毛澤東學生的劉少奇，此次在其先生面前，大發脾氣的事沒有，直接頂撞的話不多，但言必有中。毛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一會兒就說出了一大篇，米少水多。劉想半天說一句，說出來的話句句說在點子上，水少米多。

另外，在「四清」運動的具體搞法上，毛對劉的不滿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爲在「四清」運動的打擊方式上存在著過於嚴厲的情況，二是認爲在「四清」運動的打擊對象上存在著重點不明確的問題。

若對這兩點進行比較，可以說毛更看重後者。因爲，前者只是方式方法問題，後者則涉及運動方向問題。再就毛本人的歷史來看，他搞起內部整肅

運動來也是相當嚴厲的，或是很「左」的，甚至比劉有過之而無不及，前有打「AB團」之例，後有搞「文化大革命」之例。所以，毛更為關心的，不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整人，而是整了什麼樣的人。

劉強調，此次運動既要整台上的「四不清」幹部，也要整幕後的地富反壞分子；既要整黨內的壞幹部，也要整黨外的階級敵人。至於這兩者孰重孰輕，他未作進一步分別，只籠統地說這是一種黨內外矛盾相交叉現象。

毛則認為，地富反壞分子現在沒有當權，過去又被鬥爭過，被搞臭過，群眾對他們不怎麼樣；「四不清」幹部則不同，過去沒有搞臭過，現在又是當權派，能給自己多記工分，上面的人聽他們的，下面的人又怕他們；因此，要發動群眾先整我們的黨，整這些當權派，先搞豺狼，後搞狐狸⁴。

僅就整當權派而言，毛與劉也有很大分歧。

劉的目光主要盯著下面，盯著那些犯有「四不清」錯誤的社隊幹部，間或也游移到上面，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但只是點到為止。

毛不反對整執政黨基層中的壞幹部，但更想整執政黨高層中的當權派。後者可以說是他多年來施政重心所在。

1962年前，他已整過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反冒進」諸大員，整過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並將後者逐出中央領導圈。

1962年中，他又整出習仲勛領銜的「西北反黨集團」；又撤銷以鄧子恢為部長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同時既批判鄧子恢本人又敲打支持他的陳雲，致使兩人多年不在中央說話。

1962年後，他身居「二線」，但對「一線」大員日益不滿：

他多次批評所謂「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政黨），批評所謂「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前者主要批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29；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602-603。

部長王稼祥，後者主要批鄧子恢和陳雲⁵。本來毛已批得鄧與陳不說話了，但他仍抓住不放，批評不止，並以此來警誡其他大員，尤其警誡那幾位曾支持他們的中央常委。

他還批評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同資產階級打交道時不講階級鬥爭，竟提出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政黨的主張⁶。

他還指責由鄧小平領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和由李富春領銜的國家計畫委員會是北京的「兩個獨立王國」，指責他們已搞到與黨主席分庭抗禮的地步上。前一機構統管全黨政務工作，後一機構統管全國經濟工作。毛的批評矛頭已深戳到執政黨核心圈中。

到了制定〈二十三條〉時，毛又當著眾多中央委員的面嚴辭訓斥那位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副主席，並在心中生出要搞掉此人的念頭⁷。

此時，在執政黨核心圈中，只剩下林彪和周恩來兩人沒被老人家點名批評了。不過，林長期處於半修養狀況，已把軍中大部分常務性工作交由他人代理，故大多數時間不在一線上。周雖未被直接批評，但已被旁敲側擊多次。

周過問較多的國家計委、統戰部和文化部，均被毛屢屢責難，他自己身邊的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也被毛橫加指責，甚至被毛強令撤換。老人家頻頻舉起的手，雖未直接打在周公的臉上，但可說是擦著周公的身子而落下的。毛不滿意周，又要用周，於是採取了這種在其身邊飛舞巴掌的策略，不讓他疼，但叫他怕。毛周關係撲朔迷離。

此時在毛眼裡，中央「一線」已是「洪洞縣裡無好人」了，諸大員都多多少少有些問題。這就不難理解，他的「繼續革命」，不僅要整執政黨基層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53-115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76-581。

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875-888；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76。

7 斯諾，〈1970年12月18日斯諾同毛澤東談話紀要〉，《漫長的革命》（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譯本），頁263。

幹部，更是要整執政黨高層領導；不僅要先搞豺狼後清狐狸，更是要先搞虎豹後清豺狼。進而不難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讓所有中央一線大員的名字都上了造反派的大字報，並將其中許多人都打成走資派。

作為思想家的毛澤東，不失理論趣味，給他所要整的執政黨幹部起了一個學名，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並將其定性為「黨內資產階級」。

不過，在對階級一詞理解上，毛澤東與其思想導師馬克思列寧有很大不同。在先生那裡，所謂階級主要屬於經濟範疇，主要反映人們在社會經濟關係——其中最重要者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中處於何種地位⁸。

在學生這裡，所謂「黨內資產階級」，不屬於經濟範疇——因為它所指稱的那些人並不擁有任何形式的生產資料；而屬於政治範疇——因為它所指稱的那些人大都掌握一定級別的黨務權力或行政權力，並通過這些權力非法占有公眾利益，以使自己作威作福。縱然這種政治權力也與一定經濟利益相聯繫，但這種聯繫多是政治決定經濟，而非經濟決定政治。學生說的與先生說的，消極地看，是南轅北轍；積極地看，屬後浪推前浪。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更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概念。

總之，在這場關於重點整「走資派」的爭論中，毛澤東從理論上說，並不清楚他所要堅持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所要反對的資本主義是什麼；但在政治上，十分清楚他所要堅持的就是他曾說過的話、所要反對的就是不聽他話的人。因此，他所要搞的階級鬥爭，並不是真正的階級鬥爭，而只是以我畫線地排除異己；他所要整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而只是那些不敢公然反對他卻也不想完全聽從他的黨內領導幹部。

⁸ 列寧，〈偉大的創舉〉，《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1。

50

毛澤東之所以要整「走資派」，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謂接受了「蘇聯變修」的教訓。他的「國內防修」政策與他的「國際反修」政策互為表裡。

在他看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改變顏色，已經變成一個修正主義國家、一個甚至比一般資產階級國家還要壞的國家。「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是一幫流氓，比戴高樂還壞。」¹

他的這一判斷，在由其寫作班子起草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較為系統的闡述。這篇文章名為〈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刊登在《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和《紅旗》雜誌（1964年第13期）上，可視為當時國內一系列「反修文章」的一個代表作。

文章描繪了蘇聯社會階級結構的新變化：

不僅舊的資產階級分子猖狂地活動起來，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幹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新資產階級分子。

這些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構成蘇聯社會中的一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而後者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

1 毛澤東，〈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時的一些插話（1964.5.1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171。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

文章歷數了赫魯雪夫施政路線的種種錯誤：

在「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全盤否定史達林，實質上就是否定史達林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用所謂「物質刺激」，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破壞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瓦解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攻擊社會主義的農業計畫制度，……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在所謂「和平共處」的幌子下，勾結美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縱觀毛澤東在其執政二十餘年中所使用過的那些最顯忌恨的字眼，就國內而言，大多不是被用在他的老對手蔣介石身上——儘管此公仍在那裡不斷說要反攻大陸、不斷指責毛為暴政者，而是被用在他的老同事彭德懷和劉少奇等人身上；就國外而言，也大多不是被用在老對頭「美帝國主義者」身上——儘管新中國曾與他們血戰三年、並被他們封鎖二十年，而是被用在「蘇聯老大哥」身上。若老人家再世，不知還有沒有人——無論是黃皮膚者還是高鼻樑者——敢做他的老朋友或老戰友。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忌恨「蘇聯老大哥」，有多方面原因。

就意識形態來說，毛至少有兩點不能容忍赫魯雪夫和蘇共中央：

其一，毛十分崇尚階級鬥爭觀念，以致於把整個歷史唯物主義學說都歸結為階級鬥爭理論（參見本書第22節）。赫魯雪夫則傾向於淡化階級鬥爭觀念，在國內講「全民黨」、「全民國家」，在國際講「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盡量避免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發生對抗，同時勸告那些在野的共產黨盡量避免使用暴力革命手段，盡可能採取合法鬥爭方式，如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進入社會主義。

其二，毛一直懷有烏托邦意識（參見本書第38節），並於1958年付諸實踐，大力興辦人民公社。赫魯雪夫則於當年年底在同美國參議員漢弗萊交談時嘲笑了毛的這一舉動²。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交談的一方代表當時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老大哥」，另一方則來自當年毛澤東時時提防著的頭號敵國。

第二年年初，赫魯雪夫又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影射了中國大躍進運動：「我在那個文件裡對當時正在中國發生的情況，給予了相當有力的分析，並且我相信是正確的，雖然我沒有點中國的名。我們講清楚，我們對大躍進的態度是否定的。」³

1959年7月，也是中共廬山會議召開期間，赫魯雪夫又在波蘭發表了影射人民公社的講話，「聲稱1920年代在俄國追求這種想法的人『對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理解少得可憐，也不知道怎樣去建立共產主義』。很明顯，這種譴責也同樣適用於針對1950年代的中國。」⁴

就以黨際關係來說，莫斯科與北京都是：既各有所恃，也各有所求；並且是：此方所恃多是彼方所求，彼方所恃也多是此方所求。例如，莫斯科方

2 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頁188。

3 《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頁282。

4 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頁310。

面實力較強而威望不夠，北京方面則威望較高而實力不足⁵。

前者接連發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1957.8.26)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57.10.4)。後者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裡贏得革命勝利，並在朝鮮半島與西方頭號軍事強國打成平手。

然而，兩者也都有弱點。

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代表蘇共中央做了關於史達林問題報告，報告既揭露了本黨前領導人的獨裁者面目，也暴露了蘇聯社會制度的專制化性質；既使世界為之震驚，也使蘇共自己陷入窘境。

於是，在西方國家中湧起反蘇浪潮，許多人把史達林與希特勒相提並論，甚至認為前者在某些方面已超過後者，例如，希特勒主要屠殺自家營壘外的人，史達林則主要屠殺自家營壘中的人——其中一些人還曾與列寧共過事、還曾與史達林一起度過艱難歲月。在東方陣營裡，出現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反叛。即使在共產黨威望很高的新中國裡，也出現許多不滿「中蘇友好關係」的「右派言論」。在蘇共中央內部，也出現嚴重分裂，致使赫魯雪夫差一點被趕下台。因此，蘇聯需要支持，尤其需要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支持。

中共方面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度裡搞社會主義，既缺乏設備與資金，又缺乏技術與經驗，因此，中共也需要支持，尤其需要「老大哥」的支持。

然而，赫魯雪夫所求與毛澤東所恃，或毛澤東所求與赫魯雪夫所恃，總是不能很好地協調起來。赫魯雪夫不能很好地從新中國那裡得到聲望上的支持，最終招致後者的嚴辭批判，被說成是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也不能很好地從「老大哥」那裡得到實力上的資助，最終遭遇後者的斷然毀約，被中止了所有援助項目。

在中蘇諸多分歧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意氣用事，即不是出於雙方對各

5 艾倫·S·惠廷，〈中蘇分裂〉，R·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頁506。

自長遠利益的深入思考，而是起於他們對某些雙邊問題的過激反應。

如有這樣一種情況，兩者都對對方預期過高，都要求對方像對待親兄弟那樣對待自己，而當這種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便產生十分強烈的心理反差，由殷切希望驟轉為滿腹怨憤。在這十分的期待與這十分的忌恨之間也就有了二十分的距離。這就不難理解，中蘇間的怨恨往往超過中美間的怨恨或蘇美間的怨憤。

在1958年至1959年間，蘇方多次提出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長波電台和擁有一個海軍基地，以使他們在太平洋活動的潛艇能改善通訊條件，能就近加油、維修和作短期停泊。

在蘇方看來，他們的要求理應得到滿足，因為，他們已與中國建立軍事友好合作關係，他們這樣做不只是為了蘇聯的安全，也是為了中國的安全，何況他們已向中國提供了製造潛艇的圖紙，並派遣了有關專家，因此，中國應該有所回報。

但是，他們的要求遭到毛澤東的拒絕：「最後再說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聽到有人提起這件事。」

毛澤東的拒絕又引起赫魯雪夫的抱怨：「毛澤東同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在互相合作和供應方面並沒有什麼麻煩，可是我們這裡——竟連這樣簡單的一件事情都不能達成協議！」⁶

還有這樣一種情況：兩者都需要對方支持，但都不怎麼尊重對方，又都很在乎對方是否尊重自己，並準備隨時還以顏色。你不敬我，我不敬你，既有你這一次，就有我下一次，遂成惡性循環。

新中國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之初，除了缺乏物質基礎外，還缺乏技術經驗，在許多方面毫無所知，故需要老大哥給予人才上的支持。蘇聯作出積極回應，先後向新中國派遣了上萬名蘇聯籍專家，同時為新中國培養了比這數量更多的中國籍專家。

6 《赫魯雪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頁671。

這些專家遍佈新中國各行各業，承擔其間技術總管工作，為建立新中國經濟體系做了許多奠基性工作。縱觀毛執政廿七年，國家經濟發展狀況最好——既快又穩且上規模——時期，當數1954年至1958年春這段時期。在此期間，蘇聯專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自己也承認⁷，在重工業、計畫工作、銀行工作、統計工作等方面，我們由於「完全沒有經驗」，而不得不抄搬蘇聯東西，不得不聽從蘇聯專家。（不過，他又抱怨這一時期教條主義盛行，埋怨中國人過於尊重蘇聯人。問題是，他獨立自主幹的成績遠不如人家援助他幹的成績。作為同一國人，筆者都感到有些難堪）。

許多年後，一些國人把由日本引進設備的上海寶鋼項目與由蘇聯引進設備的許多工業項目進行比較，感嘆道：「小鬼子」還是不如「老毛子」，你看人家1950年代在咱們國家搞的那些項目，雖不是很先進的，甚至有點傻大笨粗，但都是很實在的，至少沒有坑蒙拐騙。

蘇聯專家與中國人友好合作關係，到了1958年發生逆轉。其責任是雙方面的。就中國方面說，主要起因於毛澤東在這一年裡大講破除迷信，大講反對教條主義；這「迷信」主要指中國人對蘇聯專家的迷信，這「教條」主要指蘇聯專家為中國人制定的規章制度。

當然，毛這樣做不是毫無來由的。從蘇聯老師方面來說，確有高傲自大、過於刻板的問題。從中國學生方面來說，也確有死搬硬套、盲目服從的問題——老人家曾經氣得說道：「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史達林的像，總比史達林矮一些。」⁸

問題是，他為此而掀起一場遍及全國並波及國外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就做得過分了。因為，他號召中國人不要再像以往那樣迷信蘇聯人，而要看到他們也有許許多多缺點；這就難免會刺激蘇聯人，使他們產生強烈的反差

7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3)〉，《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頁168-169。

8 同前註，頁169。

感，感到中國人已不打算再像過去那樣與他們交往了。

不久，蘇聯方面作出反應——也可以說是一個過分反應：撤回所有在華專家，停止所有援華項目。

自此，中蘇關係進入冰河期。

赫魯雪夫曾就蘇聯撤回援華專家事作過一個解釋⁹：

在中國，我們顧問的處境已到了簡直不能容忍的地步。成群結隊的喝醉了酒的中國人謾罵他們。他們叫我們「管卡壓」。當他們一天工作完畢回到所住的公寓和旅館時，發現手提皮箱翻過來了，房間遭到了搜查。這些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經常發生的。我們不能袖手旁觀，讓我們最優秀的專家……以自己的援助換來折磨。最後，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從中國召回我們的顧問。

就事實而言，中國方面對蘇聯專家的不恭敬，主要表現在思想宣傳上，而沒有發展到「成群結隊」去「謾罵」他們或「經常」去「搜查」他們房間的地步。赫魯雪夫所說的這類事，即使有也不是普遍存在的。此公誇大其辭。

麥克法誇爾認為，這一事件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像蘇聯政府所申明的那樣，即主要是由於中國方面不能善待蘇聯專家而引起的。他援引一個蘇聯援華專家的話，說明蘇聯政府所表達的不滿並「沒有引起大多數蘇聯顧問或蘇聯國內科學家的共鳴。」¹⁰

中共方面也對這一事件作過解釋，多是強調蘇聯領導人「背信棄義」，「乘人之危」，「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從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

9 《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頁270。

10 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頁389-393。

民的心¹¹……

這種解釋只談對方責任不談己方責任，也有失公允。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開始公開或半公開地批判蘇聯教條主義，並嘲諷那些認真學習「老大哥」的人，故不能不使蘇聯人感到中國人是在挑鬥他們，是在傷他們的心。

就當時中蘇兩國實際利益來看，有許多互補性，本不該鬧得如此意氣用事。這種互補性可從這樣兩件事中得到佐證：

一是，1960年中國政府在蘇聯方面決定撤回所有援華專家時，「曾經鄭重表示，願意挽留蘇聯專家繼續在中國工作，希望蘇共領導重新考慮和改變自己的決定」¹²；

二是，1962年蘇聯領導人在古巴導彈危機時，曾數次向中國駐蘇大使表示友好，並表示蘇聯在當時中印衝突中支持中方：「如果有人進攻中國，我們說我們中立，那就是叛徒行爲。」¹³

中蘇衝突之所以出現上述意氣用事的情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赫魯雪夫在處理兩黨關係時都擁有過大的權力，而這兩個人又都有著過強的個性。他們都很機智、很富有攻擊性，一旦吵起架來都是伶牙俐齒、得理不饒人。他們都還不大講禮儀、不大講涵養，一個竟能脫下皮鞋猛敲聯合國的講台，一個竟能穿著泳褲會見盟國的貴賓。顯然，由這兩個人物來全權處理兩黨關係，自是針尖對麥芒，非吵得一塌糊塗不可。

毛澤東在作國內政治鬥爭時，愛給對手扣上「中國的赫魯雪夫」這頂帽子，給彭德懷扣過，給劉少奇扣過。然而，就施政風格來說，他比他的這些對手更適合戴這頂帽子。

11 國防大學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401-409；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64-365。

12 同前註。

1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83-584；《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頁552。

不過，作這種比方頗有些委屈前蘇共第一書記，因為就給本國人民帶來災難而言，蘇聯的那位赫魯雪夫遠遠趕不上中國的這位「赫魯雪夫」。更何況蘇聯的那位赫魯雪夫，還是打開蘇聯堅冰的第一人，並因而成了當代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運動的先驅者。

1964年10月，赫魯雪夫被蘇共廢黜。中共爲此振奮，並萌生恢復兩黨關係的希望，於是主動作出許多表示友好的舉措：中共中央電賀蘇共新領導人就職，國家主席劉少奇出席蘇聯駐華大使館國慶招待會，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趕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並會晤克林姆林宮新主人。

對此，蘇共作出戲劇性回應，即通過一席「酒話」來表明他們的態度。在慶祝十月革命節國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向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賀龍元帥提議：「不要讓任何毛澤東、赫魯雪夫們來妨礙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雪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¹⁴

馬帥所言立刻招致中國代表團強烈抗議。蘇方解釋這是「酒後失言」，中方認爲這不是「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

應該說，中方的指責是有道理的，馬帥的確「酒後吐真言」。不過，這裡的「真言」，不僅反映的是蘇聯官員的一個真實想法，而且反映的是中蘇衝突的一個真實情況，即中蘇衝突之所以激化到如此程度，赫魯雪夫和毛澤東都要負相當大的個人責任。

事實上，中共自己也部分地肯定了這一「真言」。中共一看赫魯雪夫下台就忙與蘇共拉關係這件事本身就表明，該黨已在很大程度上把中蘇關係惡化歸因於赫魯雪夫個人。

蘇聯方面則認爲，一個巴掌拍不響，中蘇關係的障礙人物，不是一個，而是兩個，蘇聯方面是赫魯雪夫，中國方面是毛澤東；如今，蘇方障礙已經排除，中方障礙依然存在，因而恢復兩黨關係仍舊無從談起，於是，宣稱蘇

14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97。

聯對華政策不作任何改變。

周恩來總理空手返國，毛澤東主席親到機場迎接。

在社會主義陣營大家庭中，赫魯雪夫可算作老大家的第二代人物，屬於被提拔起來的一輩，毛澤東可算作老二家的第一代人，屬於自己打出來的一輩。兩者間可說是一種叔侄關係，一種較難相處的大侄小叔關係：那一個仗著自己承繼正統並頗有家底，這一個仗著自己獨立創業且位高一輩，若彼此都隨和些則能湊合著過，若彼此都氣盛些就家無寧日了。

如果在巴金的《家》中，不僅叔叔輩好生事端，而且大侄子覺新也變得刁鑽古怪起來，那麼，此《家》中將會有另一番景象。這也就是1950、1960年代之交社會主義陣營大家庭中所呈現的那一番景象。

對蘇關係問題，既是毛澤東國內政策的一個延續——同搞國內階級鬥爭、整黨內走資派相聯繫；也是毛澤東外交活動的一個中心——先以其為原點、後以其為焦點而展開其戰略部署。由於受到個人視野和歷史機遇等方面的限制，毛的國際作為比不上他的國內作為。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主要取決於他曾統治世界1/4人口達數十年之久這一事實，而非取決於他是否領導世界發展潮流、是否增進人類根本利益。

不過，毛的外交舉措還是有一些可說之處的，既有一些傑作，也有一些敗筆。

他常能在國際政治角逐中打出一些好牌，卻不能就世界發展趨勢作出正確判斷。對國際中間勢力的爭取，是新中國外交搞得較成功的一個方面。在國際舞台上，新中國常常受到美蘇兩大國擠壓而自身實力又不夠強大，故比較注意做爭取盟友的工作，並常常將工作的重心落在所謂「中間地帶」——介於中美之間、中蘇之間以及美蘇之間的地帶——上。因為，位於這一地帶的國家對於新中國來說具有很大的可變性，既有可能變為一種支持它的力量，也有可能變為一種反對它的力量。因此，新中國必須做出努力，爭取前者，防止後者。

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相對峙時，新中國努力結交許多徘徊於東西方兩大集團之間的國家，如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1954)和萬隆會議(1955)，並使自己成為這兩次會議上的明星國家，從而贏得許多亞非國家的理解與尊重。在與美國相對抗時，新中國積極發展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如與英國達成妥協，同意維持香港現狀，默許這顆南華明珠成了我們地球上最後廢除外族統治的幾塊殖民地之一，儘管北京一向高舉民族解放的大旗。作為回報，英國也採取了不同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使自己成了西方世

界中最早與中國建交的幾個國家之一，儘管倫敦一向被視作華盛頓的頭號盟友。

新中國又不斷為戴高樂將軍喝采，高度評價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向美國鬧獨立性的舉動；並使自己能於1964年1月向世界宣布，將與這一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歐洲大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與蘇聯打交道時，新中國也注意發展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不僅在與蘇對抗時，努力發展與朝鮮、越南、阿爾巴利亞和羅馬利亞的關係；而且在與蘇結盟時，也試圖發展與東歐多事國家如波蘭和匈牙利的關係。

1956年10月，波匈兩國發生反蘇事變。劉少奇率團抵達莫斯科，一方面承諾繼續支持蘇聯做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另一方面又批評蘇聯在國家關係上搞大國沙文主義，同時勸說這位大家長作出讓步，以使東歐國家能夠獲得它們應有的一些自主權。

1957年1月，周恩來率團接連訪問蘇聯、波蘭和匈牙利3國，既做和事佬又說公道話。他在莫斯科說，蘇聯人要批評自己的大國沙文主義，波蘭人也要批評自己的反蘇情緒¹。在布達佩斯說，中國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對過去領導者的不滿，並認為匈牙利關於在民族平等基礎上發展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要求是正當的²。如此調停，自是引起蘇聯人不快——赫魯雪夫抱怨周恩來給他們「上大課」；但也博得許多東歐人好感——一些匈牙利共產黨員聽了周恩來講話後不禁熱淚盈眶。

另外，毛澤東還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把美國和蘇聯畫在第一世界，把西歐、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畫在第二世界，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不發達國家畫為第三世界³。

1 同前註，頁336。

2 〈周恩來總理在布達佩斯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1957.1.6)〉，《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文叢：關於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頁122。

3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與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會談時，提出劃分三個世界思

老人家似是把他搞土改畫階級成分的方法搬到外交事務上，似是把他「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的策略用於國際政治鬥爭中。他這樣做顯然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即能強化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認同感，因為，窮人總愛找窮人說話，並且說的多是關於富人的壞話。

然而，毛澤東能夠機智地畫分世界，卻不能富有遠見地展望世界。在國際事務上，老人家作為一個預言家的記錄遠不如他作為一個謀略家的記錄。他對於世界發展趨勢的看法，較集中地體現在一篇名為〈列寧主義萬歲〉的文章中。該文由他的理論班子起草，以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為名義，刊登在《紅旗》雜誌1960年第8期上。

文章堅持認為，現時代仍然是列寧主義的時代，即「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勝利的時代」。文章以此為出發點著重闡述了兩大問題：帝國主義戰爭問題和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問題。文章指出：「只要有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這樣的國家)存在就會有戰爭：或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或為帝國主義國家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的戰爭，或為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戰爭，或為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二十餘年過去了，上述第一類戰爭和第三類戰爭幾乎沒有，第二類戰爭與第四類戰爭則有一些，而那類與「帝國主義」無關的戰爭倒是此起彼伏，其間包括中印戰爭、中越戰爭、以及中蘇邊境衝突。

文章還對核戰爭抱著一種相當樂觀的態度：帝國主義者發動核戰爭的「結果將只是這些在世界人民包圍之中的野獸自身很迅速地被毀滅，而決不是什麼人類的毀滅」；相反，「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

想：當年4月10日，鄧小平正式向世界闡述毛的這一思想；陳明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典》（中國青年社，1994年），頁184。

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在莫斯科談了類似看法。他對各國共產黨代表說，核戰爭沒有什麼了不起，充其量只能使全世界27億人口損失一半，但能換來這樣的結果：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人⁴。顯然，這種看法已不止是相當樂觀了，而是樂觀得令人毛骨悚然了。

當時，老人家是在談笑風生中講這些話的。他的老對頭赫魯雪夫在許多年後回憶道：雖然大家在毛澤東講完話後也跟著他笑了，「但他講的話絲毫沒有好笑之處」，「沒有一個人對這種講話有思想準備」⁵。

毛澤東之所以能如此輕鬆且大而化之地談論億萬人生死問題，似與他有某種「倖存者心理」有關。

新中國領導人大都是倖存者。在他們所走過的道路，倒下去的人要遠遠多於活下來的人。他們大都有多次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的經歷，並因而有了一種不同於常人的心理，姑且叫「倖存者心理」。由於各人的素質不同，他們的倖存者心理也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有的表現為一種堅守承諾的心理：我和我的戰友們有過共同的承諾，要為革命事業奮鬥終身；如今，戰友們大都犧牲了，大都實現了他們的承諾，而我還活著，還沒有最後實現自己的承諾，因此，還應繼續保持革命本色，繼續努力為人民服務。

有的表現為一種歉疚不安的心理：我的戰友們為革命已付出自己的一切，卻未能享有革命的成果；我為革命還未付出自己的一切，至少還未付出自己的生命，卻能夠享有革命的成果；我不比他們優秀，卻比他們幸運，不僅活了下來，還做了高官，我還有什麼不滿足？只有好好地為老百姓辦事才能對得起那些先我而去的戰友們。

這兩種心理都是拿自己同犧牲者比，而不是同其他人比，尤其不是同那

4 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中譯本，頁13。

5 《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中譯本），頁259-260。

些官運亨通的人比。這兩種心理都可以從《彭德懷自述》中讀到，更可以從這位將軍的所作所為中評品出來。

還有的表現為一種僥幸苟活的心理：老子好不容易活下來了，就得好吃、好喝、好玩，搞一點腐敗也無妨；老子搞、兒子搞、妻子搞，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如此作為就如同老話所說的「打下城池，縱兵三日」。

毛澤東執政後曾對身邊人說：「中國共產黨裡，好人早都死完了，現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屍走肉。」⁶ 上述那些因僥幸活下來而熱衷搞腐敗的中共高幹，大概就屬於他們的主席所說的「行屍走肉」。

再有的表現為一種漠視生命的心理：看到生命被毀滅的情景太多太經常，以致變得對這類事麻木了；尤其是在遭遇自己最親近者相繼死去這一系列殘酷事實打擊後，也就變得沒有什麼殘烈的事不能忍受了。其中一些人還會產生一種姑且叫做破罐破摔的心理：自己既已失去最寶貴的東西——至愛親朋，也就不在乎失去其他什麼東西——如非親非故者。

於是，這些人談起要死人的事來就像談平常的事一樣。毛澤東正是以這種心態在莫斯科暢談核戰爭後果的，只是說出來的死人數目太大了些，致使聽者心驚肉跳。

不過，老人家還是很在乎自己生命的。他彌留時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問大夫他還有救嗎？當獲得肯定答覆後，他臉露紅暈，顯出歡娛之情⁷。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問題，〈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強調，革命「就是意味著被壓迫階級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著革命戰爭」。文章還引用列寧的話說：「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並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不經過國內戰爭就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這篇文章不否認有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為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提出要有暴

6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1994年中譯本），頁366。

7 同前註，頁3-9。

力革命與和平發展兩手準備；但又引證列寧的話說：「那種和平發展或和平過渡的機會，即使有，也是『非常罕見的』。」文章明確表示，列寧這一觀點沒有過時，仍有現實意義。

三十餘年過去了，不僅無產階級革命的和平發展樣式是「非常罕見的」，就連無產階級革命都是「非常罕見的」，似乎可以說，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發生過「無產階級革命」。

不過，在那些非帝國主義國家中倒是發生了許多革命，但其中能使共產黨奪得政權的革命也是「非常罕見的」，僅有一例，即由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革命。

波爾布特及其黨人就是打著毛澤東旗幟而搞起武裝鬥爭的。他們發誓要讀毛澤東的書，要聽毛澤東的話，當然也要拿毛澤東的資助。可是，他們一奪得政權就大規模地殺人，殺了柬埔寨1/6人口。在他們所殺的人中，有很多是華僑，是他們的毛先生的同族人。

其二、重視與大國的外交，但缺乏對大國國情的了解。

二戰後，美國與蘇聯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一個主導西方世界，一個領銜東方陣營。

新中國一登上國際舞台，就面對這兩個龐然大國，就不得不與它們打交道，或予聯手，或予對抗：先是實行「一邊倒」，合縱蘇聯以反「美帝」；後又搞起「乒乓外交」，連橫美國以防「蘇修」。另外，在這「合縱」與「連橫」之間，還有一段孤軍奮鬥時期，既抗「美帝」也反「蘇修」，與前者在台灣問題和越南問題上公開較勁，與後者在黨際關係和邊界畫分上吵得不可開交乃至大打出手。

毛澤東作為執政黨主席一向抓大事，在外交上則抓對蘇關係和對美關係這類大事，並使他所抓的這些大事都帶上他個人的許多色彩。他無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熱切希望中國能夠躋身世界大國之列，能夠在國際重大事務上獨立自主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而不是僅僅跟在某一大國後面作一幫腔者。顯然，他的這一要求不會容於那些已是世界大國的國家。因為，他這是要與那些大國分享已為他們擁有的大國權威：或是勻走他們的一部分國際影響力，或是抵銷他們的一部分國際影響力。因此，與新中國崛起相伴隨著的，是它與其他大國——或為這一大國或為那一大國——關係的持續緊張化。

他也無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深知國際角逐是以實力為後盾的，同時也深知他所執掌的國家除了人口數量外，其他方面都很難與蘇美等國相抗衡。使他在扮演國家首腦角色時十分注意發展同大國的關係，以避免發生自己獨自不堪承負的國際衝突。

由於是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國處於對立狀態，各自都以對方為最大敵國，同時也都以一種非此即彼的眼光來審視它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因此，

一個政治色彩鮮明的國家，或一個自稱最講原則的國家，不大可能同時發展與這兩大對立國家的友好關係，而只能在兩者間作出抉擇。

毛或為主動或為被動地順應了這一形勢，在與大國交往中採取了一種非此即彼的態勢，並因此而能夠藉助一方以反對另一方。並且他所藉助者和他所反對者都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可以互換的：或此一時打得火熱彼一時又恩斷義絕；或此一時勢不兩立彼一時又相見恨晚。與此相應，新中國也就有了毛執政初期的中蘇友好關係史和毛執政後期的中美友好關係史，也就有了兩個相對安全時期。在這兩個時期裡，新中國基本上免除了遭受某一大國直接進攻的可能性。

1950年代初，新中國雖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發生武裝對抗，但由於已同莫斯科結盟而使得華盛頓不敢輕易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蜿蜒如帶的鴨綠江和圖門江，成為美國轟炸機就此返航的地形標誌，儘管江那邊正源源不斷地向江這邊輸送痛打美國佬的武器彈藥。美軍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三番五次請求華盛頓批准轟炸中國境內軍事目標，以有效破壞志願軍補給線，但遭美國總統杜魯門拒絕。後者認為：「如果我們決定將戰爭擴大到中國，我們就必須防備敵人的報復。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在條約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們進攻共產中國，那麼我們就必須預防俄國出面干涉。」¹

1969年3月，中國與蘇聯發生領土糾紛，兩國數千公里邊境線上不時砲聲隆隆。中國此時處境十分艱難：國內「文化大革命」已成為長期動亂，國外擴大邦交工作已處於停滯狀態，並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處於敵對狀態，與美國宿怨未消，與蘇聯新仇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面臨著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形勢。

雖然蘇聯政府未必真想與中國全面開戰，但中國領導人在制定其國家戰略時必須作出這一設想。遇事要考慮到最壞方面，是對一個負有重大責任者的起碼要求。毛澤東不會不清楚：中蘇間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蘇聯雖不能

¹ 《杜魯門回憶錄》，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中文本），頁448。

征服中國，但定能重創中國，它無論在常規武器方面還是在核武器方面都比中國強大得多。

當時在英國，一個叫維克多·路易斯的蘇聯間諜假借新聞記者身分「透露」一個消息，即蘇聯將對中國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將有可能動用核武器襲擊中國羅布泊核基地²。其可能出現的結果用美國人的話說，蘇聯人「可以在30分鐘內突襲並摧毀中國微不足道的核力量」³。

在此形勢下，毛澤東當務之急就是要謀求一種戰略平衡，就是要尋求一種國際力量或能直接援手中國或能從旁牽制蘇聯。為此，老人家將他那朦朧的眼睛轉向西方，轉向唯一具有這種實力的國家——美國。

美國方面也樂於發展同中國的關係——美中之間本來就沒有那麼多利害衝突，並樂於在這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打上楔子——美國不懼怕單個蘇聯或單個中國，但懼怕這兩者之和。

到了1970年代初，北京與華盛頓便由私下偷情發展到公開相愛，度過了一段蜜月時光，並隨之建立了一種戰略呼應關係。據當事人季辛吉回憶⁴：

中國方面明確表示：「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不會威脅日本和南朝鮮，不會出兵印度支那——「這個保證消除了美國兩屆政府的惡夢」；

美國方面則充分認識到：「不管中國的長期政策如何，我們的中期利益在於同它合作，並支持它的安全和頂住外來壓力。」

儘管季辛吉在談美國的義務時，帶有美國人常有的那種直率且不怎麼謙虛的口氣；但就毛澤東來說，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2 托馬斯·魯賓遜，〈中蘇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中文本），頁280。

3 尼克松，《領袖們》，頁316。

4 《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第4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中文本），頁16-18、51。

可見，毛之所以重視與大國的外交，主要出於他對中國國家安全的考慮。新中國對美蘇兩大國的親疏態度，主要取決於後兩者對於前者的安全具有什麼樣的價值，正面價值則親，負面價值則疏。誠然毛最初之所以喊蘇聯「老大哥」，除有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外，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但他後來轉而與美國拉關係，就完全出於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了。正如季辛吉所承認的，北京和華盛頓由於實用主義而結合在一起⁵。

與此相聯繫的一個後果，是毛澤東對這些大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考慮得較多，而對它們本身的基本國情缺乏應有的了解。

1957年，蘇聯接連發射了世界上的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顯示了它在某些空間技術領域已超過美國。

毛澤東為此感到鼓舞，很快就向世界宣布他的一個結論：「現在蘇聯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等強大的工業國家。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蘇聯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規模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⁶

後來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一文也宣布：「蘇聯在經濟上技術上的飛躍，把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遠遠地拋在後面，而且在技術上也把美國拋到後面去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在軍事技術上已經占了優勢」。

顯然，上述結論是不符合蘇聯實際情況的。後者雖在某些技術方面領先美國，但在整體實力上尤其在遠洋作戰能力上還沒有超過美國，充其量僅達到與後者相匹敵的地步。這可以從後來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中看出，即看出雙方都懼怕與對方全面開戰，並都主動向對方作了讓步⁷：

美國方面，公開作出承諾，不再入侵古巴，並從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針對蘇聯的導彈；

5 同前註。

6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11.6）〉，《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頁101。

7 《赫魯曉夫回憶錄》，頁690-711。

蘇聯方面，則穿著衣服進古巴光著身子出古巴，先是秘密運進核導彈，後又公開撤出核導彈，即在撤出過程中拉開裝運核導彈船隻上的覆蓋物，任憑美國戰機在其上空穿行拍照。

顯然，蘇聯在軍事實力上並不像毛澤東替它宣布的那樣強大。否則，它就不會在波濤起伏的加勒比海上跳起這種不太雅觀的「脫衣舞」來，就不會因此而蒙受恥辱。

誠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不了解另一個國家的情況，未必是缺點，比如，我們不能埋怨毛澤東對烏干達或烏拉圭知之甚少；但問題是，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把本國的安全同另一個國家聯繫在一起時而又了解這個國家的實情，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了。

當然，他不需要了解這個國家的所有實情，比如，毛不需要了解莫斯科國家芭蕾舞劇院正上演什麼節目；但問題是，他應該了解這個國家的基本實情，尤其是它在軍事方面的基本實情。人們也能夠理解他很難準確地把握這個國家的軍事實情，因為他所要把握的東西是人家最為機密的東西，是不到最後一刻不會翻開的底牌；但問題是，他應該出言謹慎，而不該說連人家自己都不敢說的那種大話，更不該將這種大話說給全世界人聽。

民主人士張奚若曾批評執政黨「好大喜功」。就實際情況來看，他還可加上一句「誇誇其談」。1957年，蘇聯人發了人造地球衛星，毛澤東高興得不得了，隨即宣布蘇聯已經超過美國。一年後，中國人也發了「衛星」，發了諸如畝產萬斤糧之類的「衛星」，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又高興得不得了，馬上就開始談論如何「五年趕上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等振奮人心的事了。

古巴導彈危機爆發時，也正是中印邊界衝突緊張時。蘇聯政府表達堅決支持中國的立場，中國政府也表達了堅決支持蘇聯的立場。兩國政府皆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當雙方各自所面臨的緊張局面都平息下來後，蘇聯上說中國欺侮了印度；中國人也隨即指責蘇聯在向古巴運進導彈時犯「冒險主義」錯誤——沒有摸清情況便貿然行事，在從古巴運出導彈時又犯了「投降主義」

錯誤——不敢與美帝國主義硬抗到底⁸。

蘇方的說法，讓世人覺著其領導人太實用主義了；中方的說法，則讓世人覺著其執政者既好為人師又唯恐天下不亂。

1976年1月，毛澤東在與尼克森的女兒和女婿會談時，表示不能理解「水門事件」，不能理解僅憑幾卷錄音帶就能把一位大總統搞下台、就能把他的「老朋友」搞得如此狼狽。當然這並不妨礙他能就此問題作出十分肯定的結論來。

當來訪者告訴毛這事關西方政治時，老人家立刻打斷他的話，不屑一顧地說，什麼西方政治？那是假的。又當來訪者告訴毛現在美國有許多人反對尼克森甚至有一些人要求審判他時，老人家再次打斷他的話，鬥氣地說，我邀請他馬上訪問中國，消息可以登報。對話者當面沒有反駁他，但心中很不以為然，認為此人既不了解西方政治的實情，也不尊重美國人民的感情，還固執得很⁹。

毛澤東在此談話中所不能理解的東西，不是美國萬花筒中的一個普通景色，不是像好萊塢又推出什麼新影片之類的事情，而是美國的一個基本國情，甚至可以說是整個西方社會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即國家權力是分割開來且又相互制約的。

毛澤東對「水門事件」的隔膜，反映出他的知識結構存在著某種缺陷，某種不符合他身分的缺陷：

一，作為一個大國領袖，一方面期望與美國建立戰略策應關係，並重視與美國總統建立個人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美國的基本國情、不大

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83-585；《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9日、《紅旗》雜誌，1963年第22期。

9 劉亞洲，〈「中國人愛好和平」〉，載於俊道等編，《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54-456；參見R·特裡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本），頁491-508。

了解美國總統的個人權限。

二，作為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一方面說資本主義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¹⁰，而且「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一天好起來」¹¹；另一方面又不大了解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究竟是怎樣建構的。

事實上，相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至少現在沒有一天天爛下去。反之，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社會主義國家至少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國家，早在老人家生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就開始一天天爛下去了；並在老人家身後的「改革開放」中一天天分化開來，經濟體制一天天市場化，行政權力一天天腐敗化。

10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頁679。

11 《紅旗》雜誌編輯部，《列寧主義萬歲》，1960年第8期。

53

其三，能夠維護主權，卻難以深交朋友。

關於毛澤東治下中國，人們可以說出種種不是，但找不出喪權辱國這一條。在這塊土地上，統治者任意折騰老百姓的事情時有發生，但這統治者不是異族人，而是本族人。興之由中國人自決自取，衰之亦由中國人自決自取。

新中國在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中沒有訂立過什麼城下之盟，在與世界大國的交往中沒有喪失過什麼民族尊嚴。這對多數人來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或許有人指責它曾允諾港澳地區繼續維持殖民地狀況和承認外蒙古獨立。人們可以為之辯解：它的這些舉措只是沿襲舊政府的做法，而非出於它自己的創意，當然其中也有出於它自身權宜的考慮。

或許還有人指責它與大國交往或冷或熱，或向蘇聯「一邊倒」或與美國太親近，缺乏自身應有的沉穩感和莊重感。人們也可以為之辯解：它的如此做法出於維護國家利益的考慮，出於如何在大國壓力下為新中國謀求最佳戰略地位的考慮。

對於毛澤東來說，如何處理中蘇關係曾是一個較為棘手的問題。

一方面，新中國應同蘇聯搞好關係。

在黨際關係史上，中共曾得到蘇共許多幫助。就連中共自身的創建活動都是在蘇共的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曾端坐過金髮碧眼且崇論閎議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¹。中共雖曾受過蘇共或共產國際瞎指揮之苦，但畢竟得過人家許多好處，故在奪得政權後不能不與人家建立友好關係。

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56-60。

1990年代，國內媒體屢屢把西方國家對中國異見人士的支持說成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若歷史地看，這種說法不免帶有一種自我否定的意味，明著在說人家現在的「不是」，暗地承認自己過去的「不是」。因為，按這種說法，執政黨就很難說清楚自己是如何創建的，很難說清楚蘇俄人為什麼可以跑到另一個國家中去直接支持一個圖謀推翻本國現存社會制度的政黨，而後者竟也欣然接受了這一「來自境外的敵對勢力」的支持。

在意識形態上，中共一直奉列寧為思想導師，承認「十月革命的一聲砲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把蘇聯的今天看作是中國的明天，真誠地以蘇聯為楷模。

在現實利益上，新中國也急需這位走在前面的「老大哥」能夠照應一下後來者，一是能夠在經濟建設上給予援助以利於恢復戰後的經濟，二是能夠在國家安全上給予支持以利於抗衡美國的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對俄國人抱有戒心。

在國家關係史上，俄、日同為中國的近鄰大患。在眾多欺侮過中國的列強中，搶走最多銀子的要數日本，搶走最多土地的則要數沙俄。後者搶走的土地數量相當於毛主席家鄉湖南省面積的7、8倍，或相當於蔣委員長家鄉浙江省面積的15、16倍。銀子可以再攢，土地則不能再生。所以，就對中國國家資源的掠奪來說，俄國人是拔了頭籌的。這就使得現代中蘇關係發展始終伴有一種較為陰暗且又塗抹不掉的背景畫面。

就國民心態看，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許多非中共系統出身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始終存有對俄國人的疑慮；在中國北方一些地區的老百姓的口中，「老毛子」（指俄國人）是與「小鬼子」（指日本人）並稱的。

在現實交往中，蘇聯領導人也做出過一些氣量狹小的舉動。史達林曾懷疑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後會成為另一個鐵托，故在莫斯科似熱似冷地接待了這位中國同志的拜訪，使得後者興沖沖而來悻悻然而去。後繼者赫魯雪夫在與中國同志打交道時也不大講涵養，做起事來冒冒失失，吵起架來口無遮攔。當然此公也不乏有坦誠直率之處。

無論史達林還是赫魯雪夫，都是雖有世界大國領導人的身分，卻無世界大國領導人應有的氣度。

史達林執政前，主要搞地下活動，生活在白色恐怖中；執政後，很愛用秘密警察，製造出紅色恐怖來，竟將蘇共第17屆中央委員會中的60%以上成員或捕或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是很不健康的，既有恐懼心理，也有對恐懼心理過度反彈的殘忍心理，還有「病態猜疑心」²。他曾將此猜疑心用到那位來自新中國的客人身上，致使此人久久不能釋懷³。

赫魯雪夫則從烏克蘭頓巴斯礦區一步步爬上蘇共第一書記位子。在這種一黨專政體制(中國也實行這種體制)內，能從基層爬到高位這件事本身就表明，此爬升者(不論是蘇聯的爬升者還是中國的爬升者)的人格是受過多次扭曲的，其品性其教養都是大有問題的。

證一，在這一爬升過程中，他們必須經過許多次政治鬥爭——他們所在的體制就是一個內鬥不止的體制；

證二，在這許多次政治鬥爭中，他們總是站在最有勢力的一方——他們作此選擇不僅能獲得勝利者的讚賞，而且能獲得失敗者留下的空缺，從而使自己更上一層樓；

證三，他們所投靠的最有勢力的一方，很可能是最爲錯誤的一方——最有勢力者最難以受制約，故而最容易犯錯誤；

證四，他們在內心中即使不能在事前也能在事後知曉他們跟著最有勢力者做了錯事——他們大都很聰明，至少能明辨常識；

證五，他們在表面上都會裝出一副從未做過錯事的樣子——最有勢力者最不願意認錯(正像毛澤東不願意否定「文革」、鄧小平不願意平反「六四」

2 赫魯雪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赫魯雪夫回憶錄》中文本，頁776。

3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3.10)〉，《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頁171；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9.2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39。

一樣)，若想繼續依附最有勢力者就必須與他們保持一致，就不能夠認錯；

結論一：長此以往，就會使他們養成一種很爲勢利並很缺乏羞恥感的政治品格；

結論二：在一黨專政體制(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下，選拔官吏的過程往往成了擇劣的過程：提取糟粕——趨炎附勢者、寡廉鮮恥者，剔除精華——剛正不阿者、襟懷坦白者。

另外，他們在長期爬升過程中，總是小心謹慎地夾著尾巴做人，總在專心致志地觀察並迎合上司的一言一行。

他們一旦成了大人物後，就會做出強烈反彈，就會將自己一直受到擠壓的個性猛然膨脹開來，盡一切可能地擴張自己，表現自己，四處伸手，到處炫耀。

束縛久了的尾巴驟然釋放開來，就會一個勁地向上高揚起來並左右搖擺不止。這正如中國老話所言：「小人得志便猖狂」。

毛的新中國正是在上述正負意義參半的背景下同蘇聯「老大哥」打起交道來的，既希望友好，又心存疑慮，生怕做出有損民族尊嚴的事來。這種友好心態非常敏感且非常不穩定。他們臉上笑容可掬，內心卻十分緊張，隨時準備對蘇方有可能提出的無禮要求，作出十分迅速且又十分強硬的反應，致使對方先是茫茫然後則憤憤然。

據赫魯雪夫記述，有一次，史達林突然喜歡起菠蘿罐頭來，便讓下屬給中國同志拍電，希望後者拿出一塊土地讓蘇聯建立一個菠蘿罐頭廠。中國同志很快回電，說我們很樂意接受你們的建議，但最好由你們提供貸款，由我們建設工廠，日後再用該廠產品償還貸款。史達林獲悉後，便「在那裡咒罵和發火」⁴。

數年後，赫魯雪夫自己也向中國同志提議，希望後者能夠允許蘇聯在他們國土上設立長波電台和潛艇碼頭。毛澤東很快回話，說這已涉及國家主權

4 《赫魯雪夫回憶錄》中文本，頁662。

問題，是不能討論的。這一回就輪到赫魯雪夫在那裡不高興了⁵。

新中國不僅在對蘇關係上，而且在對美關係上以及對其他國家關係上，都表現出強烈的國家主權意識和民族尊嚴意識。新中國領導者們大都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儘管他們聲稱自己終身的政治信仰是馬克思主義，但他們最初的精神戀人並不是來自域外的這個主義或那個主義，而是發自本土的民族主義。他們大都是從民族主義者演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即使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仍深懷著依戀故土的情感。

尼克森曾談道：「一位新聞記者曾經問過周恩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您更多的是中國人還是共產主義者？周恩來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國人。』當然，周恩來的同事都是中國人，但是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才是中國人。」⁶

事實上，周恩來大部分同事也和他一樣，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黨人。

儘管他們聲稱自己曾經從事的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但他們最初投入革命的動因，不是為使中國資產階級獲得更多發展的權利，而是為使中華民族避免亡國滅種的命運。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有三大任務：民族，民權，民生。其中第一條，就是要使中華民族獲得解放。辛亥革命前，中國同盟會的民族主義口號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⁷；辛亥革命後，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主張為：「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⁸

由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兩大任務：反帝，反封建。其中第

5 同前註，頁671-672。

6 尼克松《領袖們》中文本，頁309。

7 孫中山，〈同盟會宣言(1905.8)〉，《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頁68-69。

8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1.23)〉，《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85。

一條，也是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

近代以來，中國革命者大多是在遭遇民族危機或民族恥辱時起而抗爭的。這種抗爭包括對外與對內兩個方面：

一方面，中華民族任人宰割的現狀，使他們不能不反擊外強；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所孕育的智慧，使他們不能不明白一個簡單道理：若自己要不倒則別人打不倒，要禦侮就必須自強，要自強就必須變革，要變革就必須改制，要改制就必須首先改革本國政治專制體制——其運作者占有社會資源最多，故而對社會變革最敵視。

W·羅斯托在其現代化研究中，描述了一種他稱之為「反應性民族主義」的現象——強大的外部壓力往往激使弱勢民族走上變革自強的道路⁹：

羅馬教會的壓迫、西班牙的威脅、荷蘭的競爭、以及法國的挑戰，促發了英國的17世紀革命；在拿破崙戰爭中所蒙受的恥辱，以及在戰後英、法、澳、俄諸國所給予的壓力，促發了德國的1848年革命；受其他歐洲國家歧視的境遇，促發了俄國的彼得一世改革運動；被美國海軍強行打開國門的遭遇，促發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

羅斯托還談到中國，指出這個國家的革命也是起於她所蒙受的百年屈辱。用我們自己的話說，由禦侮而興變法，由救亡而興革命。

近年來，中國大陸媒體也在某種「輿論導向」下，鼓動起一種以「中國人可以說不」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其間有鼓動者方面的情況，也有被鼓動者方面的情況。

在此，筆者只談前者，只談鼓動者這樣做出於何種考慮：

其一，在國家內部，想藉以重建價值體系，恢復民族凝聚力。

9 W·W·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第3章（商務印書館，1962年中文本），頁24-43。

當代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價值失範社會。

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民族文化傳統，已被數十年此起彼落的革命大潮衝擊得七零八落。如今不乏見到這樣的國人：在如何精打細算上，還能夠看到一些成熟文明的影子，在如何待人接物上，則能夠看到那種剛剛把一條腿跨入文明社會門檻的半野蠻人的風貌。

本世紀由歐洲引入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被毛澤東不斷掀起的左一個運動右一個運動折騰得讓許多人不敢相信了。如今那些滿口馬列主義大道理的人，往往不是被人看作騙子就是被人看作傻子。

不難想像，在這樣一個新老傳統均已失範的國度裡，要想在精神和情感上把不同背景的人聚攏在一起，除了皈依宗教外，就只有高揚民族主義這一條路了。因為，大家好歹都屬於同一個中華民族，都不能不既共同分享她的榮耀又共同分擔她的恥辱。

其二，在對外關係上，想藉以拒斥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壓制不同政見者做法的批評，並回應一些國際勢力因見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而生出的戒心和敵意。

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世人看好，但中國的政治形象不為國際社會稱道：一是在人權問題上，一個所謂「泱泱大國」，竟容不下幾個不同政見者；二是在吏治問題上，一個所謂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國家，竟被一些與其打過交道的國際工商人士排在世界上官員最腐敗的國家之列。

中國這些不如人意方面尤其前一方面，雖不能說受到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批評——相反還得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認同；但可以說受到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的批評——儘管批評的方式和程度不盡相同。

就中國人內心來說，是很看重發達國家的意見，很看重它們的批評的。道理很簡單，一個將要或想要從貧民區搬到上流社會住宅區的人，比較在乎的不是那些老街坊們如何議論自己，而是那些未來鄰居們怎樣看待自己。

可是，中國政府在外表上又很強硬，常常擺出一副我自個兒的事愛怎麼做就怎麼做誰也甬想管的架勢。不幸的是，在其強硬的外表上竟有兩個柔軟

的部位、兩個很容易讓人觸痛的部位：一個是台灣問題，一個是西藏問題。這是兩個能使中國政府一觸即跳的問題。

西方國家無疑看準了這兩點，並在上面大做文章，以回應中國政府在人權等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你不是什麼都不在乎嗎？那好，咱們就來做做這方面的遊戲吧。於是，這些國家紛紛向中國打出台灣牌或西藏牌。

一方面，它們以各種名義(官方或非官方)邀請台灣政府人士和西藏流亡人士訪問該國，激得中國政府怒吼不止。

另一方面，它們又利用自身在民主制度和分權體制上的長處，很輕易地推卸政府方面責任：或者說，本國政府是民選政府，並且本屆政府首腦還想在下一次大選中競選連任，因而要考慮選民方面意願，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來，故請中國政府能予體諒，多多關照；或者更簡單地說，那是國會幹的事，與政府無關。

這好比是，把打了你的左手背到身後，把沒打你的右手放在身前，並急匆匆地告訴你，那是左手搗的鬼，右手可老實著呢，故請看在右手面子上，繼續與我們友好相處吧。

它們顯然是在打「擦邊球」，既能觸到中國政府的真正痛處，又不致使中國政府作出諸如斷絕外交關係之類的激烈反應。

這裡不難看出，西方國家上述外交策略是頗為老道的，同時不難看出，現時中國在一些外交問題上處於十分被動甚至被人耍弄的境地。可是，中國的文明史比它們的文明史要悠久得多。當中國的先秦人已在搞合縱連橫外交時，這些國家的祖先們或許正在中歐森林裡為一隻獵獲到的熊究竟屬於誰而打得不可開交。這種現實與歷史的反差，使得許多國人不時有揪心之痛。

近來中國政府似乎也用上西方國家所用的一些策略，默認乃至讚許一些民間人士掀起針對西方國家尤其是針對美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當外國記者質詢此事時，政府發言人頗為得意且不無戲謔地答道：這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幹的事，與政府行為無關；他們所言所行只要不超出法律許可範圍，政府就予以干預。

可問題是，當不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而是廣大知識分子真要起來搞真正的民族主義，即不僅要拒斥外國的輕蔑、而且要變革本國的現狀以自強自尊時，就不知政府還堅持不堅持此事與政府無關的說法，會不會呈「葉公好龍」狀。

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矛頭所指往往是兩重的：一是指向外部那些任意掠奪中國財富或不願看到中國強大的他國政治勢力，二是指向內部那些有礙民族肌體健康發展的本國社會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本國人民實行專制統治的政治制度。

換句話說，被激勵起來的民族主義是要扎回馬槍的，即由最初扎向外部強敵轉而扎向內部苛政、扎向腐敗政治、扎向貪官污吏。

因此，對於執政者來說，鼓動民族主義就如同在驅使一隻能夠在空中畫出折返弧線的老虎。這只老虎既可以朝著前方猛撲驅使者要它捕食的對象，也可以回過頭來撕咬驅使者本人。

54

毛澤東的新中國，在捍衛國家主權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它想要做到的事，但在交朋友方面有成功有失敗而不盡如人意。簡略地說，它能做到廣交朋友，從非洲的塞拉西皇帝到美國的黑豹黨都能拉上關係；卻難做到深交朋友，凡開始與它好得就像是親兄弟似的朋友，到頭來幾乎都要與它吵翻臉，並吵得就像是不共戴天似的仇人。

在與蘇聯關係上，先是把人家尊為「老大哥」，與之休戚與共；後又把人家視作「現代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與之兵戎相見。

在與越南關係上，先是「同志加兄弟」，人家要什麼東西給什麼東西；後又與人家大打出手，打得諒山老山屍骨如山。

在與阿爾巴尼亞關係上，先是把人家比作「一盞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並大發感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後又與人家反目成仇，互揭老底，互訴老朋友的種種不是。

在與朝鮮關係上，先有數十萬志願軍官兵血灑鴨綠江東，繼有不計其數的中國物資源源輸向這個兄弟國家；末了兩國雖未公開決裂，但已面和心不和。北京申辦公元2000年奧運會竟得不到朝鮮同志的一票，氣得中國老百姓既責怪平壤當局不講交情，又抱怨自家政府怎麼盡交這樣一些不三不四的國家。

另外，在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相處時也有類似情況。新中國曾一度與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相處得很好，周恩來總理曾是新德里最受尊敬的貴客（1954年），劉少奇主席也曾是雅加達最受歡迎的國賓（1964年）。可到後來，這兩個國家都把中國看作最具威脅性的國家，前者同中國打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邊界戰爭，後者在國內搞了一場大規模的排華運動，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同中國沒有外交往來。

這似乎成了毛的新中國交要好朋友的一種模式：先以好得不得了開場，繼以壞得不得了收場；先是歡度蜜月，後是發生婚變。這種不斷搞對象又不斷打離婚的模式，讓世人尤其讓後人覺得老人家辦外交就像小孩子辦過家家酒似的，說相好就相好，說翻臉就翻臉。

誠然，有些翻臉的事，如中越邊境戰爭，是在老人家去世後發生的，但這些事之所以發生的最初原因可追溯到他生前的一些舉措中，如對越共或親或疏，如對柬共盡心盡力。

另外，老人家不善交朋友不等於其下屬也不善交朋友。事實上，像周恩來、陳毅、張聞天、王稼祥這些中共大員都很有外交才幹，至少很有外交眼光。這裡僅以王稼祥為例。

1960年代初，王稼祥在國內外形勢都很嚴峻的情況下，主張適度調整國家對外政策，變過於強硬為比較溫和，變過於理想為比較務實，從而為正處於困境中的新中國爭取到一個較為寬鬆的國際環境。他建議，在國際交往中，應適當緩和同西方國家、同東歐國家、同其他一些國家的關係，避免與它們發生不必要的衝突；在國際援助上，應量力而行，不要把國內挖得太苦，不要做自己力不從心的事¹。他的這一建議後來被概括為「三和一少」。

王的主張無疑是對症下藥的。然而，給人下藥的前提就是斷定此人已染疾病，對毛的外交政策欲予調整的潛台詞也就是斷定這一政策已有不當之處。顯然，這是在摸老虎屁股了。很快，毛就將王的主張斥為修正主義外交路線，並將王本人逐出中共外交決策圈。

歷史已證明，王的主張是實事求是的，是有生命力的，雖未在毛生前得到認可，卻能在毛身後獲得實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就堅持了這個「三和一少」（所謂「鄧小平的外交路線」包含了前人的思想成果）。

全面緩和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關係，不再像過去那樣一會兒罵這個是

1 王稼祥，〈實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3.31）〉、〈略談對某些國際問題的看法（1962.6.29）〉，《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44-460。

帝國主義一會兒罵那個是修正主義；

全面緊縮對外援助項目，不再像過去那樣打腫臉充胖子，不再把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大大方方地施捨出去(到頭來還不落個好，人家一升米做個恩人，自己一斗米養個仇人)。

毛澤東很難深交國際盟友，表明他的外交戰略及其實施方式存在嚴重缺陷。

毛在外交上有多重目標：

其一，在國家利益上，他要做中華民族福祉的維護者，要為新中國謀求最佳國際戰略地位；

其二，在意識形態上，他要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要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其三，在國際義務上，他要求新中國能夠顯出大國風範，能夠在國家交往中抑強扶弱並慷慨解囊於人。

不過，他的這些目標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衝突的：

如果新中國要為自己謀求最佳的國際戰略地位，那麼，它就會得罪自己的意識形態盟友。

1970年代初，中國出於自身國家安全考慮而積極發展與最大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結果導致一些馬列主義政黨以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如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古巴等)對中國黨以及中國政府產生猜疑乃至敵視。

如果新中國要做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去支持一些國家的革命，那麼，它就會激怒這些國家的政府，並促使這些國家與其他國家結成同盟來防範它或反對它，從而不利於它爭取最佳國際戰略地位。

1960年代中，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展與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關係，最終促使印度尼西亞軍政府與中國政府決裂，並向當時中國的最大敵國美國靠攏，同時積極參與籌組具有反北京傾向的東南亞條約組織。

如果新中國在自身沒有大國實力的情況下硬要顯示大國慷慨風貌，那麼，它就會狠挖自己的家底，大傷自己的元氣；並有可能使受援國對它產生

一種類似藥物依賴的心理，即只有提供援助才能維持友好關係，甚至只有不斷增加援助才能維持友好關係。這就如同人們吸食某種藥物成癮後的情況一樣，即只有不斷加大劑量才能保持最初吸食時的快感。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不斷發生一些第三世界小國同中國關係由熱變冷的情況。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中國拿走了它們的東西，而是因為中國沒有給它們東西；甚至不是因為中國沒有給它們東西，而是因為中國沒有按它們越來越大的胃口給它們東西。

固然，一個國家的外交戰略是可以有多重目標的，因為一個國家的外交關係是多方面的，故有多向度的利益追求。可問題是，應該在這些不同目標間排列出先後次序來，使主要的優先於次要的，使次要的服從於主要的。

從常理上說，一個國家在不違反國際通行準則的情況下，應該將國家利益方面的欲求列於首要目標，而將其他方面的欲求列為其次目標。就實踐來看，凡外交事務辦得比較成熟亦比較成功的國家大都採用這種目標序列。

如美國近年來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時就遇到多重目標問題，按其人權主張，就應制裁中國，如取消中國對美貿易最惠國待遇。按其國家利益，不僅不應制裁中國，相反還應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因為，就經濟發展前景看，人口眾多的中國可以為美國企業提供十分廣闊的市場；就地緣政治戰略看，身形巨大的中國恰好站在美國的兩個潛在競爭對手日本和俄羅斯的背後（反過來看，美國對於中國來說也具有相似的地緣戰略意義）；就聯合國權力運作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對於由美國倡導的大規模國際行動，可以採取否決的態度，如否決聯合國軍轟炸南斯拉夫，也可以採取默認態度，如默認聯合國軍轟炸伊拉克。

兩相比較，美國的人權主張最終還是要服於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國會中的制裁聲浪無論怎樣洶湧澎湃，就是衝不破白宮裡的否決權堤壩。

新中國外交也有這方面的成功例證。在中國與各國關係中：中國與巴基斯坦關係較為特別。兩國關係雖從未達到像中蘇關係、中越關係、中阿關係所曾達到的那種熱烈程度，但比它們穩定得多、持久得多。究其原因，不難

發現，雙方政府在建構這一關係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兩國意識形態的異同或兩國領導人的好惡，而是兩國共同具有的長遠戰略利益。這就使得兩國關係既不會因國際陣營的分化而出現裂痕，也不會因兩國政府的變更而受到影響，更不會因其他國家的鼓動而發生反目。

但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在處理中國多重外交目標時，不能始終堅守一個較為確定的目標序列，有以國家利益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也有以意識形態或其他價值取向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並在具體實現過程中時有情緒化的表現。

1970年代初，中國發展與美國關係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甚至可以說，新中國只是到了此時才開始實施自己的最佳地緣政治戰略。不過，毛在具體處理這一關係過程中，有時很情緒化地將中美間的國家關係渲染為他與尼克森間的個人關係。

就在尼克森因「水門案」被迫辭職而在美國成了過街之鼠時，毛澤東發出邀請，歡迎下台總統訪華。這顯然有向美國國會乃至美國人民叫板的意味：你們美國人不喜歡此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毛澤東很喜歡此人；你們趕他下台，我們請他做客。

據代為接受這一邀請的尼克森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回憶，他聽到毛澤東說這些話時，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美國公民，而不是作為前總統女婿，被傷害了；並認為這不是說給他一個人聽的，而是說給兩億美國人聽的，那是「兩億座火山」。（參見本書第52節）

顯然，毛的這一邀請，雖是盡了他個人對尼克森的情分，卻有損中國政府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故有損中國國家利益。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宣稱：

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²

2 毛澤東，〈對莫斯科中國留學生實習生的講話(1957.11.19)〉，《毛澤東思想萬

實際情況是：就在毛說話時，中蘇關係已經出現裂痕，比如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在核戰爭問題上、以及在史達林評價問題上，雙方主張都不相同；在此之前，赫魯雪夫1954年第一次訪華後就預感：「同中國人的衝突恐怕難以避免了」³；在此之後，最起勁地反對這兩個「頭」的人，正是宣稱要有這兩個「頭」的人。

顯然，毛關於兩個「頭」說法的出發點，不是國家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具有政治宣傳色彩，並十分情緒化。

可見，毛澤東在處理新中國外交關係時擁有多重目標，但未能理順其間的序列關係，一會兒以此為首要目標，一會兒又以彼為首要目標。如此做法，時間較短還顯不出什麼，時間一長就會顯出其外交舉措是前後不一的，甚至是前後衝突的，就會使他的國際盟友生出種種疑問：

你過去說要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重，如今怎麼又講要以中國國家利益為重呢？

你過去說要對兄弟國家傾力相助，如今怎麼又講要對援外項目量力而行呢？

.....

顯然，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很難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信任關係，尤其很難為自己在友邦中建立那種較為持久的信任關係，即很難深交朋友。

這就好比去赴一個要吃許多道菜的宴會，絕大多數人都是這道菜吃多些

歲(1957-1961)》，頁108。

3 《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文本，頁665。

那道菜吃少些，唯有毛澤東竟把每一道菜都吃到極致處，都吃個大飽，結果只能是邊吃邊作間歇性嘔吐，吃飽這一道菜後，就去倒空它，接著再吃飽下一道菜……

毛澤東所督辦的中國對蘇聯外交、對阿爾巴利亞外交、對越南外交，都可以說是一種嘔吐性外交，先是食慾大開，猛吃社會主義同盟風味大菜；接著大倒胃口，劇烈嘔吐起來，把猛吃進去的東西甚至把自己胃裡的膽液都狂吐出來；接下去又開始吞食中國國家利益風味大菜……，如此吃法是要吃壞自己身子骨的，如此吃相是要嚇壞同席進餐者的，使之望而生畏、不敢再與這位吃吃吐吐者共享佳餚了。

毛澤東在國際難以深交朋友，在國內更是如此。他的國際行爲方式實是他的國內行爲方式的延續，即他在國內黨內慣於「克熟」的行爲方式的延續。曾與他共過事的人不計其數，能和他共始終的人寥寥無幾。當此公彌留時，垂淚在旁的老友僅葉劍英一人，而葉某還算不上他的一等戰友，僅爲新中國十大元帥中的末帥。就是這位老友也被他整肅過，並對他懷有不滿，一等他過世就大動斧鋸將他晚年傾力搭起的文革戲台拆去半邊。

55

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在國內搞起了兩方面階級鬥爭：一是在全國城鄉開展「四清運動」；二是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封資修」，即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精神產品。

後一方面還可分出兩個層次：一是在文化藝術領域(戲劇、電影、音樂、美術、文學作品等)開展批判運動，二是在思想學術領域(哲學、歷史、經濟、文藝理論等)開展批判運動。相對說來，毛澤東對前一層次過問較多，對後一層次過問較少。

文化藝術產品雅俗共賞，似乎什麼人都可以根據自身感受予以訴說。思想學術產品則為陽春白雪，只有少數人才能夠依據一定學養予以評析。這學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相關知識，二是研讀心性。晚年毛澤東似是不缺前者，很缺後者。

他已「耳不順」多年了，聽不得不同意見，也看不得不合自己口味的文章。其閱讀生活已成信馬由韁之勢，多是由著性子想讀什麼就讀什麼，不想讀什麼就不讀什麼。另外，他已不動筆寫大塊文章了，也就不感到有認真辨析各方說法的需要了。他已超越了學術論戰，故也失去了參與學術論戰的能力。

自1962年底起，毛澤東就開始談文化藝術方面的階級鬥爭，並一發而不可收地談下去。越談話越多，越談火藥味越重，以致濃煙滾滾，最後轟然起火為「文化大革命」。

1962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華東省市書記時對戲劇界作了一番評論¹：

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48。

「有害的戲少，好戲也少，兩頭小中間大。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占優勢。梁山泊不出糧食，採茶燈不採茶，舊的劇團多了些，北京的京劇團就不少。過去的文工團只有幾個人，反映現代生活，不錯。」不過，舊戲中的《楊門女將》、《罷宴》還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說服不了他們。

毛此時批評戲劇界，還留有一些餘地，雖指出好戲不多，但承認壞戲也不多；雖不滿意舊戲泛濫，但補充說其中不失有好劇目；並表示要進行分析，要以理服人。

1963年，毛澤東更經常地談到戲劇問題，語氣也更趨激烈：

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之類²。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聽說最近有些改進。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果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國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³。

在毛對文藝工作所作的諸多批評中，語氣最重影響最大者，要數他分別

2 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指示(1963.9)〉，《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94。

3 毛澤東，〈對《戲劇報》的兩次重要指示(1963.1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95。

於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所作的〈兩個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⁴。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⁵。

前一個批示批的是各種藝術部門特別是戲劇，後一個批示批的是各個藝術協會及其專業刊物，但都已接近全盤否定了。不過，這還主要說事，說有關部門和有關機構的事。接下來，老人家就要談人，談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1964年9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老撾客人時談道：

「勝利了，搞社會主義建設，搞了十五年，我們文化界比不上你們。有

4 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批示(1963.12.12)〉，《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374。

5 毛澤東，〈對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批示(1964.6.27)〉，《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441。

幾百萬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界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小學教師也有不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化界唱戲的、畫畫的、唱歌的都有，新聞界好一些，電影界也有。現在他們受不了了。現在又整風，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整他一年兩年睡不著覺我就高興。」⁶

文藝界聞風而動，在毛作了上述第一個批示後便進行了第一次整風，整了1個月；在毛作了上述第二個批示後又進行了第二次整風，整了10個月。這一下文藝界真的睡不著覺了，老人家該高興了。

在兩次整風前後時間裡，一批文藝作品及其作者受到批判。

戲劇方面受到批判的有：昆曲《李慧娘》（孟超編劇，該劇作為「鬼戲」最先被拋出來接受批判，成為八屆十中全會後文藝革命的第一個犧牲品）、京劇《謝瑤環》（田漢編劇），等等。

電影方面受到批判的有《北國江南》（陽翰笙編劇，沈浮導演）、《早春二月》（謝鐵驕編劇、導演）、《革命家庭》（夏衍、水華編劇，水華導演）、《林家鋪子》（夏衍編劇，水華導演）、《紅日》（瞿白音編劇，湯曉丹導演），等等。

與此相關，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夏衍等因領導失誤而被免職，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也因強調「寫中間人物」而被指責為資產階級中間力量在黨的文藝領導機構中的代言人。

作為執政黨主席，毛澤東無論做什麼事總會有響應者，此次搞文藝領域裡的大批判也不例外。不過，與以往相比、甚至與同時進行的「四清運動」相比，他此次做此事的響應者、尤其是有資望的響應者要少得多。

毛以下的中央常委，除半病修的林彪外，其他人都不持積極態度，至少沒有表現出他們在「反右派」、「大躍進」時曾表現出的那種亢奮狀態來。這或是因他們曾跟著毛整知識分子整得心有愧意，或是因他們正忙於收拾毛

6 毛澤東，〈接見老撾愛國戰線黨文工團團長、副團長和主要成員的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309。

退居「二線」後留下的爛攤子而無暇他顧。

中央常委以下的那些分管文藝工作的領導人，如彭真、陸定一、周揚、齊燕銘、邵荃麟、鄧拓等，也都持審慎態度。一方面，他們作歡迎狀，因為，黨主席臨幸文藝界，當是他們誠惶誠恐的事。另一方面，他們又憂心忡忡，因為，老人家此番到他們負責守望的園地來，不是為了踏青觀花，而是想要操刀弄戈。若他只是去趕殺那些外部闖入者，或拒斥西方的「資產階級文藝」，或拒斥蘇聯的「修正主義文藝」，他們或許還能跟在後面搖旗吶喊。若他反過身追究他們這些守望者的責任，責怪他們護園不力，竟容忍各種「封資修」毒草到處滋生，他們就將無言可辯乃至無地容身。

最初，在還沒有大規模整人時，他們對於這種批判是支持的。如周揚在1963年10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強調「在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樹立批判的旗幟」，批判各種新老資產階級思想和各種新老修正主義思想⁷。

繼而，當許多作家及其作品被打上黑色標記時，他們開始猶豫了，並試圖將一些由「左派」文人挑起的思想衝突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內，盡量不傷及作者本人。

最後，到了自身也被打入黑幫中時，他們徹底失望了，其中責任重大且品性高潔的鄧拓自殺身亡，決意不再與這場運動發生任何關係了。

鑒於許多中央大員對開展文化領域批判運動持不積極態度，毛澤東只得將目光壓低，投向執政黨內較灰暗的層面，從中尋覓能夠為他充當文化打手的人。

在中央裡，他對康生多有依仗。此公長期負責中共情報工作，既搞黨外敵人的情報，又搞黨內同志的情報，是一個在製造冤假錯案方面有特殊才能和重大業績的人。

八屆十中全會後，他積極協助毛搞文化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出面點

7 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紅旗》雜誌，1963年第24期。

了許多文藝作品及其作家的名，將他們打入另冊，還組織「左派」筆桿子，對楊獻珍(哲學)、孫冶方(經濟學)、翦伯贊(歷史學)等學者進行理論圍剿，致使中國學界噤若寒蟬。

在地方上，他對柯慶施多有青睞。此公多年主持中共華東局，一向亦步亦趨於毛，用薄公的話說，已把毛主席的心思琢磨透了(參見本書第20節)，並因此深得後者信任。他所管轄的上海市，成了毛澤東位居「二線」時最愛滯留的地方之一，也是北京「一線」為請示「二線」而頻頻南下的目的地之一，最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

另外，他還為毛澤東搞文化專制主義提供了一批像張春橋、姚文元這類以筆為刀的文化酷吏。他們既是此時的文化批判運動的參與者，也是稍後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官，是從主帥毛澤東麾下最先殺出來的一彪人馬。

八屆十中全會後，柯慶施較早聽到毛澤東談舊戲改革問題，並迅速作出反應，提出「寫十三年」(即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三年)的口號，甚至說不演十三年的戲就不看⁸。在批判「鬼戲」《李慧娘》及其辯護文章〈有鬼無害論〉期間，用江青的話說，「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就是由柯慶施組織人起草的⁹。

毛澤東四下尋覓文化打手的眼光，也落到自家屋簷下，看上了夫人江青。當然，這裡面也有後者積極請戰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末，中共中央曾因毛澤東與賀子珍婚姻關係斷得不甚明白以及江青個人生活經歷不甚清楚而作出限制後者公開露面的決定，致使此人被政治塵封二十餘年。她長期以來坐著中國第一夫人的實位，既有表現自己的渴望，又有表現自己的演技，卻因受禁令而不能公開展示自己。可以想像，這個女人會有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毛啓用此婦人，一方面，表明他如今不再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226、1229。

9 江青，〈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年)，頁38。

遵守那個中央決定了，不再「金屋藏嬌」了；另一方面，表明他如今搞文化批判運動已是「蜀中無大將，廖化打先鋒」了，竟讓一個三流演員來對整個文化界指手畫腳，或說是予以羞辱。

江青最先做的是文化監察工作，勿寧說是文化特務工作，用其本人話說，「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干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¹⁰ 如今國中，有人仍在從事這種「審讀」工作，仍在從事這種「文化特務」職業，江清餘孽猶在，文革遺風猶存。

1964年6月，江青公開出席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並在其間舉行的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大談戲劇領域階級鬥爭嚴重性：

「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餘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八十多個是文工團，其餘2,800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¹¹

與毛澤東對文藝工作所作的上述批示相比，江青對戲劇界現狀作的分析要具體得多，其間還作了數字分析。幾天後，毛讀到這個講話，欣然批語：「講得好」¹²。

¹⁰ 同前註，頁29。

¹¹ 江青〈談京劇革命〉，《紅旗》雜誌，1967年第6期。

¹²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230。

56

1960年代，毛澤東對新中國文藝工作抱否定態度。十幾年後，其黨人對其否定也抱否定態度。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1963年和1964年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中對文藝工作的指責，不符合實際情況。」¹

然而，後者對前者的否定也有不妥之處，把毛的指責概括為「不符合實際情況」這一說法本身也不符合實際情況。例如，毛所指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問題，就不是憑空想像的，而是有一些根據的。其夫人還為此作過數量分析，雖談不上精確，但談出了大致實情。薄一波在許多年後也承認，當時文藝界「確實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反映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新劇目」，「與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動的舊戲相比，還是顯得太少。」² 因此，毛澤東當初之所以能把文藝界批評得無話可說，其間既有後者畏懼前者的因素，也有前者確實說到後者痛處的因素。

顯然，對於毛澤東的批評，很難用一兩句話予以斷評，必須從不同層面予以闡釋。

在評價層面上，毛的批評是過於嚴厲的，如斥責整個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並已跌到修正主義邊緣的說法，打擊面過寬，打擊力過重。——這一斥責已為中共中央所否定。

在描述層面上，毛的批評是有些根據的，如揭示戲曲舞台上演的多為「古人」、「洋人」和「死人」，就不能說是捏造，就不能說是老人家在造謠。——這一揭示已為薄一波所確認。

1 〈中共中央關於認真學習貫徹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精神的通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冊，頁422。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222-1223。

在解釋層面上，毛的批評則是相當蒼白，如偏重於指責文藝舞台上多為舊戲而鮮有新戲，卻很少去說明文藝舞台上為什麼會出現這般景象。——對此，無論中共中央還是薄一波均語焉不詳。

如果說毛對此有過解釋的話，那麼，他的解釋也只停留在這樣一個層面上，即新中國不得不接受國民黨留下來的各種文化人才，並讓他們繼續操持舊業，而這些人大多屬於難以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這一解釋既大而化之又亂扣帽子，不足以回答新中國文藝界為何難出新品尤其不出精品這一惱人問題。

歐陽修曾說，詩人往往因處境窮困而作出好詩，「殆窮者而後工也」；並且處境越窮則詩藝越精，「蓋愈窮則愈工」。（〈梅聖俞詩集序〉）

司馬遷也說，大凡古之名篇如《周易》、《春秋》、《國語》、《詩經》、《離騷》等，都是古之聖賢作於困境中的，傳世之作亦是發憤之作。太史公的《史記》也是如此，也是他作於刑辱之下的。（〈報任安書〉）

兩夫子說的是一個道理：苦難的經歷有助於成就偉大的作品。那麼，他們的這一文論能否適用於他們的那些後人呢？

20世紀無疑是中國人民苦難叢生的世紀：

上半個世紀，中國人打了一場又一場戰爭，既同外國人打，又同本國人打，直打得血雨腥風；下半個世紀，中國人搞了一場又一場運動，既搞經濟運動，又搞政治運動，竟搞得民不聊生。

若再將時間跨度縮小些看：

上半個世紀後20幾年，中共黨人承受了人世間難以想像的苦難，走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掉了成千上萬顆腦袋；下半個世紀前20幾年，中共黨人製造了人世間難以想像的苦難，搞出中國史上的最大饑饉，釀成人類史上的最大文禍。

前一時期，最苦難者要數敢於反抗舊政權的人，尤其是那些拿起槍桿子的人；後一時期，最苦難者要數敢於批評新政權的人，尤其是那些仍保持革命精神的中共黨人和那些仍保持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

依「窮而後工」說，這一世紀的深重苦難，應該有助於中國人更深刻地認識歷史、認識人生，進而有助於他們的文化人創製出相應的文化精品來，即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然而，就實際情況看，這個世紀的中國人雖承受了巨大的世間苦難，卻未獲得相應的文化回報，或者說「國家不幸詩家也不幸」，「窮」而後卻不「工」也。

人們僅在1920、1930年代前後時間裡，還多少能看到一些斑斕的文化色彩；1949年以後，就幾乎看不到任何絢麗的文化景象，相反倒能看到許多極為醜陋的文化現象。尤其是那些1920、1930年代的文化明星們，一到毛澤東治下就黯然失色了，就不再有什麼佳作問世了，致使他們的創作生涯呈虎頭蛇尾狀。

從中共黨人方面來說，至少應該創製出許多能反映他們如何歷盡艱險打天下的佳作來。連一些外國作家都對此深信不疑，甚至躍躍欲試。埃德加·斯諾就曾對紅軍長征發出感嘆：「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³ 實際上他自己就很想把它寫出來。

哈理森·索爾茲伯理記住了斯諾的感嘆，並打算由自己來做這件斯諾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他懷著極大的熱情去尋找這一寫作機會，並抱著極大的耐心去等待這一寫作機會，一直等到七十六歲高齡時，才獲准親臨紅軍長征的路線，並據此寫出一部美國版的長征史詩《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⁴。

3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頁181。

4 關於此書寫作情況，見哈理森·索爾茲伯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文版自序》（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魯迅先生也曾為陳賡將軍向他描述的紅軍業跡感動不已，並萌發創作衝動，想寫一個類似蘇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那樣的小說，但最終未能成稿。據知情者馮雪峰解釋，這主要是「由於他不熟悉紅軍及其戰鬥的實際情況，這很難使他造成創作所需要的真實感。」⁵

魯迅先生在此寫作上的進與退，似是表明這樣一種見解：若想真實感人地寫出中共黨人所走過的艱難歷程，就不僅要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寫作情趣，而且要有親身的革命經歷。換句話說，此事最好由中共黨內的那些既會舞文弄墨又有革命資歷的知識分子來做。

可是，在中共後來的人員構成中，這類知識分子最為匱乏。

這個黨原本就是由知識分子創立的，其後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高潮中以及在1930年代的抗日民族主義高潮中，又吸收過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很不幸，這個黨在其革命過程中損失最大的部分就是它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其中，既有被國民黨慘殺的——如方志敏、惲代英、瞿秋白、以及柔石、胡也頻，都被作為「共匪」處決了；也有被自己人冤殺的——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湘鄂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黨員、以及中央蘇區和陝北蘇區中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黨員，都被當作「AB團」清洗了（參見本書第25節）。

當革命成功時，這個黨裡仍還活著的老資格知識分子黨員寥若晨星，並都成了職業官吏或職業政治家，主要從事那種十分功利且十分忙碌的工作，不大可能去搞那種身心均須處於自由狀態的創作活動。

他們所用言辭講求實用性，講求直截了當，以使平常百姓一聽就能明白。一部《鄧小平文選》的詞匯量，大體上不超過一本普通中學文化水平讀物的詞匯量。這種表達方式屬於普通的應用文體，很難歸為高雅的美文文體。

他們能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十分匱乏，故很難從容地進行創作活動，很難

5 馮雪峰，《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頁94。

長久地盯著一個作品，琢磨它的方方面面。詩人元帥陳毅曾很想寫一個反映中共早期革命鬥爭的劇本，但一直苦於沒有時間，後來當眾向其上司周恩來抱怨此事。後者則當眾批准他一個「創作假」，一個只是說說而已的「創作假」⁶。說完話，陳還得要去忙他的副總理諸多事務，而只能在工作之餘偶發一下文墨之情，作一兩首詩詞，得一二言佳句。

做詩填詞，可說是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中的一道風景線。該群落中凡有才情者大都愛做此事。究其原因，無非兩條：一是詩言志方式多樣，既可暢快淋漓，也可吞吞吐吐，故比較適合中共高幹在黨內外鬥爭中時而豪放時而隱忍的心態；二是做詩無需大塊時間，車上馬背，飯後茶餘，即可哼哼然而成篇章，故比較適合這些忙忙碌碌者不時想偷出點空來宣泄一下文思才情的需要。

有點例外的是，曾由毛澤東大力提拔起來的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三大常委都很少做詩，至少在他們坐上高位後鮮見有詩。這或許是一種巧合，或許與他們都非常講究實際有關。前者說過「吃小虧占大便宜」的話，中者說過「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的話，後者則說過「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話。人過於實際，就與做詩無緣了。

至於那些資歷較淺但也經歷一段艱苦創業時期的知識分子黨員，大都在1940年代的「整風運動」中被整肅過思想，後又在1949年後的歷次運動中被觸及過靈魂。其中那些專職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幾乎都被嚴加批判過，有的還被關進監獄裡。出自軍旅的解放軍作家是如此，出自城市的地下黨作家也是如此，前者如《保衛延安》的作者杜鵬程，後者如魯迅先生的許多弟子們。

毛澤東曾說，他的心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1949年前，前者不時向人們談起自己對先生的仰慕之意。1949年後，後者的諸多門人，從胡風到蕭軍等——均是先生在思想文化領域留下的嫡親骨肉——個個挨整，以致於他們在1949年後的處境還不如他們在1949年前的處境。雖不能說他們蒙冤受屈

6 洗濟華，〈周總理給陳毅創作假〉，《中國演員報》，第52期。

都是出於毛本人的籌畫，但可斷定他們為人處事都不適合毛當政的時代。

大陸知識界傳有一句戲言：魯迅先生如果活得長久些，準是個大腕級「右派」。從此言中可看出人們對毛自我表白的那句話是很懷疑的：「要麼你的心後來變得不與魯迅的心相通，要麼你的心本來就不與魯迅的心相通。」對於魯迅以及像魯迅這種類型的人，毛澤東可以做到遠而敬之，但不能做到近而聽之。他一坐上執政者位子就容不得那種嫉惡如仇且不平則鳴的知識分子。

馮雪峰是一個有著特殊身分的中共文人。他是魯迅的學生，也是魯迅晚年最爲親近最爲信賴的摯友之一，另外還是魯迅與毛澤東之間的思想聯繫人。

毛澤東曾通過馮雪峰了解魯迅先生。1933年底，馮雪峰從上海潛入江西蘇區，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屢屢找他談論魯迅，有一次見面就說：「今夜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只談魯迅。」⁷

魯迅先生也通過馮雪峰知曉毛澤東。1936年4月，馮雪峰又從陝北蘇區潛回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他很快找到魯迅，向先生「談長征情況，談毛澤東做的黨內鬥爭和毛澤東的堅強性格。他說，『周先生的韌性戰鬥精神，後繼有人了……』」⁸

就在馮雪峰穿行於上海與蘇區間這段時期裡，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屢受排斥打擊，魯迅則在思想文化界屢遭明槍暗劍；馮本人，在蘇區屬「毛派」的人，在上海爲周氏知己。從這裡，一可看出，此時毛的處境與周的處境頗爲相近；二可看出，馮在處世爲人上絕非趨炎附勢之輩，其晚年遭遇更能說明這一點。

馮雪峰屬於中共內最爲匱乏的那種既有卓越文才又有革命資歷的知識

7 陳早春、萬家驥，《馮雪峰評傳》（重慶出版社，1993年），頁157。

8 《胡風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56。

分子黨員。他既是詩人、作家、文學批評家，又是親身走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故屬於那種能將紅軍長征業績寫成史詩般作品的最佳人選，很可能是唯一人選。

馮自己也十分清楚這一點。他曾以缺乏真實感為理由來替魯迅放棄寫紅軍小說進行辯護，但此次就無法以同樣理由來為自己推卸責任了。於是，他拿起筆開始了這一創作過程、這一漫長曲折且終無結果的創作過程。

1937年底，他請長假回義烏老家寫作，鄉居三年，數易其稿，寫成五十萬字文稿，定名《盧代之死》。1942年2月，他突然被捕入獄，遂將此稿失落。

新中國成立後，他重寫此稿，但在寫的同時接連遭遇厄運，1954年因《紅樓夢》研究問題被解除《文藝報》主編職務，1955年因「胡風事件」被迫檢查，1957年又因「右派問題」被開除出黨，最後不得不將第二次寫出的幾十萬字文稿鎖入箱中。

1961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於是翻出舊稿，準備寫完此書，以了卻心願。很快，他就被告知，像他這樣的「摘帽右派」不適宜寫作像兩萬五千里長征這樣的重大革命題材。這一次，「他不再把這部稿子鎖回箱子，而把它投入熊熊爐火之中。二十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焚燒的不僅是文稿，也是他的心。」⁹「他的頭髮從兩鬢花白到滿頭皆白，彷彿在頃刻之間。」⁹

人們還可補充說：這把火燒掉的，不只是他個人的心血，還有中國工農紅軍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形象；這種獨特的藝術形象，由於這個獨特的藝術家的故去，而永久地失去了。如今，人們只見老紅軍蕭峰留下的長征日記，不見老紅軍雪峰本應留下而終未留下的長征史詩；只見外國作家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不見中國作家寫的「長征——記憶猶新的故事」——《盧代之死》。

執政黨如此處置馮雪峰及其作品，實屬精神自戕行爲，即自己毀棄自己

9 吳長華，《馮雪峰評傳》，第10、20-21章（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

通過遭受苦難而積聚起來的文化資源，使自己在經歷千辛萬苦後而不能獲得相應的文化回報、不能創製相應的文化精品。當然，這不等於說該黨毫無文化精品可言。事實上，這個黨也產生過一些有較高文化水準的佳作，比如產生過像《毛澤東選集》(第1-4卷)和《毛澤東詩詞》(37首)這樣的佳作。

就《毛選》來說，雖有過於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仍不失為一部文史哲兼達的名著。它是中國百年來一部最有政治實用價值的論說文文集，從中可清晰地看出中共由井岡山到中南海的發展軌跡。另外，它還是「五四運動」以來一部非常優秀的白話文文集，通俗易懂，清晰生動，比起毛澤東的老對手蔣介石的文章來，更有可讀性，更容易打動中國老百姓的心。

至於《毛詩》，魯迅先生曾稱其間有「山大王」氣¹⁰，即有霸氣，有草莽氣，或說是有一種怪異的雄渾之氣。此詩主不僅做了山裡的「大王」，而且做了國中的「大王」。其詩文自是雜呈綠林、秀才、王者諸般氣象，確為中國詩壇之尤物。

然而，毛澤東(包括為其文字潤色的人)的文化成就，在其黨內屬特殊現象，用曹孟德《短歌行》裡的話說，屬「月明星稀」現象：月兒太明亮了，致使周圍許多星星顯得模糊起來，其中一些星星完全看不見了。在中共思想文化的夜空中，人們常常只見皓月當空，不見群星燦爛，只知有《毛選》、《毛詩》，不知有其他錦繡文章。

不過，這當空皓月，只是一輪孤寂的月亮，一輪帶著寒意的月亮，不能與星辰同輝，不能讓知識界感到溫暖。

10 陳早春、萬家驥，《馮雪峰評傳》(重慶出版社，1993年)，頁157。

57

新中國文化藝術界，除有中共知識分子外，還有所謂「黨外知識分子」（毛澤東在1960年代常常帶著情緒談起他們，稱之為舊社會留下來而新政權不得不接受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前者鮮有文化精品，後者能否予以補償呢？人們指望後者能做什麼？

若指望後者能很好地用藝術形式去反映中共黨人所承受過的苦難，似是難爲了他們。這是要他們去做他們做不了的事，去做連魯迅先生也望而卻步的事。沈從文寫得了湘西風情，寫不了江西軍情；艾蕪寫得了南行記，寫不了長征記；老舍先生寫得了正紅旗下，寫不了太行山上。

若指望後者能很好地用藝術形式去反映中共黨人所製造出的苦難——也是他們中許多人所親身承受過的苦難，似也難爲了他們。因爲，他們既有作此創作的有利條件，也有作此創作的不利條件，兩相比較，後者更爲重要些。

這些知識子無疑擁有許多可資創作的素材，擁有許多對苦難的直接體驗。

在毛澤東知識分子政策的關照下，他們大都有過十分坎坷的經歷，不是在此次運動中出問題，就是在下次運動中出問題，躲過了「反右」，躲不了「文革」。縱觀這些人走過的一生路程，就數在中南海紅太陽照耀下走過的這段路程最顯曲折，拐了許多個彎，每個拐彎處都有過一個揪心的故事。

有一個爲筆者所熟識的藝術家，出身上海富家，早年同情革命，曾爲中共地下黨秘密運送過紅色宣傳品；進入新社會後，歡天喜地，只覺得眼前一片陽光，無論做什麼事都有用不完的勁；到了1957年，晴空打雷，因出於好意給黨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繼而被扔進社會最底層，過了二十餘年暗無天日的生活；1960年在勞改農場中幾乎餓死，餓得他這位昔日上海各大飯

店的常客竟成了老鼠和蛇的天敵，在地裡幹活時只要抓住這些小動物就立刻活剝生吃；後來逃到新疆，與小偷乞丐為伍，破衣爛衫地流浪了十餘年。如今，藝術家已過上舒適的生活，但心中仍不能完全擺脫往日的陰影，白天歡聲笑語，晚上常做惡夢，尤其是冬夜被子蓋得不嚴時準做惡夢，夢中情節多是勞改隊裡的事，多是「隊長」又朝他吼了什麼的事。

除擁有可資創作的素材外，這些知識分子還擁有進行創作的技能。這是他們的強項。與來自「解放區」的知識分子相比，出於「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受過更多的學術訓練，擁有更高的專業素質。胡喬木與季羨林為清華大學同級生，前者很早參加革命，後者一直經營學業。一個成了中共筆桿子，一個成了清華名教授。前者長於起草政治文件、整理首長文稿，後者長於鉤沉文化典籍，撰寫學術專論。

文學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像老舍、沈從文那樣的大手筆，在延安作家群中是看不見的。誠然，後者中也有一些文學稟賦較高的作家，但他們大都結局不好，如才子王實味被砍了腦袋，才女丁玲被打成「右派」。有了感人的創作素材，有了精湛的創作技巧，還未必能創作出好作品來。作家們還需要有其它條件，就客觀方面說，還需要有一個較為寬鬆的創作環境；就主觀方面說，還需要有一種較為從容的創作心態。然而，就新中國文化界實際情況來說，這兩者都無從談起。

就創作環境而言，新中國的作家們大都缺乏能夠自由寫作、自由出版、自由評論的空間。他們必須不折不扣地接受執政黨領導，只能在後者嚴格畫定的圈子裡從事文藝創作活動，只能搞一種「鳥籠文學」或「鳥籠藝術」。

作家們，常常被要求去寫這一題材或那一題材——這些題材對於他們來說，很可能既不熟悉也不喜愛。例如，常常被要求去寫那種歌功頌德的文章，去歌頌說一不二的執政黨是如何英明正確的、以及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是如何親切溫暖的——這對於那些原本有些傲骨的作家來說，是很難下筆的。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寫那種階級鬥爭的故事，去編織這一撥人如何要置另一撥人於死地，以及另一撥人又如何反過來要置這一撥人於死地的情節——這對

於那些生性溫文爾雅的作家來說，是很不適應的。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寫那種非常表面化的題材，去描寫那種紅旗飛舞、群情激昂、豪言壯語不絕於耳的場面——這對於那些筆觸細膩、擅長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的作家來說，是很感驚扭的。……

稿子即便寫出來，也未必能夠出版，還須報送有關部門審查。這種審查主要不是依據藝術標準或學術標準，而是依據政治標準。一部書稿，不管有多高的藝術性或學術性，只要不能達到執政黨的政治要求，就不會獲准出版。

這種政治標準對於許多作家來說，尤其對於許多造詣很高的老作家來說，是很難達到的，甚至是不想達到的。於是，他們很少動筆了，即使動筆也很難寫出佳作了，並因而造成一種令執政黨十分尷尬的局面：新中國文化藝術成就在許多方面還趕不上舊中國文化藝術成就。

並且，這種政治標準就其自身來說，是非常不確定的，是隨著執政黨內政治鬥爭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

小說《保衛延安》，因涉及彭德懷將軍指揮西北野戰軍的事跡，在廬山會議前被認為是好作品，在廬山會議後被定為「黑小說」，遂遭查封。

電影《燎原》，則因涉及劉少奇參與領導安源煤礦大罷工的事跡，在1966年前被認為是好作品，在1966年後被打成「黑影片」，遂遭禁演。

由此可見，這一政治標準從其骨子裡說，不過是一種極為庸俗的政治實用主義的代名詞而已，是隨著官場權勢的變化而變化的，就像是舊時官宦人家看門人臉上的那雙不時作仰上俯下翻動的勢利眼。

作品即便問世了，也未必能夠獲得公正評論。因為，文藝評論所依循的批評標準也要政治掛帥，也要以黨內鬥爭的需要為轉移，甚至要以某些權勢人物的臆想為轉移。康生沒看過小說《劉志丹》，卻能憑猜測而斷定它是反黨的，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也沒看過此書，竟能夠帶著肯定的口氣念了康生寫的條子（這句話後來成了他名下的一條語錄），並就此發了一通議論：「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

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個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府，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¹

從事創作活動需要有一個好的心境，既要有衝動的激情來奮筆疾書，又要有從容的心態來感悟評品。然而，這種心境對於新中國裡的許多作家來說，僅是一種奢望，至少在1957年後僅是一種奢望。或許在新中國紅旗的掩映下，他們的臉上常顯笑意，陪著對自己不大放心的執政黨笑，陪著識字不多的群眾笑，有時也為自己笑一笑——此次運動我總算過關；但其內心是十分酸苦的，是欲哭無淚的，隱有愁痛，隱存羞愧。

接連不斷的整人運動，使得作家們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有所顧慮，甚至有所恐懼。昨日張作家犯錯誤了，今日李作家也犯錯誤了，明日或許就要輪到自己犯錯誤了，所以，從現在起就要格外小心，盡量不去碰那些有可能引起爭議而禍及自身的問題。

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發表後，受到許多好評。電影製片廠決定將它搬上銀幕，並請作者本人將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就在此時，有人指責小說宣揚「人性論」，宣揚「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這些說法在當時都是文藝工作者深感恐懼的「大帽子」。迫於壓力，作者在改編時不得不「把那些有可能涉及到『人性論』和『溫情主義』的地方刪的刪，改的改」。後來一些文藝工作者如趙丹等將電影與小說進行對照，深感失望，「認為電影不如小說，把小說中最感人的地方給刪去了……」，比如，影片拍到父親終於找到失散多年且無時不在想念的女兒時，竟沒有流出熱淚的鏡頭²。

許多作家在伏案創作中，不時停下筆來抬起頭，四下打量，看看那些拿著「帽子」提著「棍子」正盯著自己的好事者；隨後伏下身來抓起筆，塗塗改改，一直改到自以為人家抓不到話柄為止。作家如此創作，一是不可能集

1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9.2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42。

2 周哲，〈周恩來和趙丹談文藝需要民主〉，《炎黃春秋》，1996年第10期。

中精力，二是不可能堅持己見，故而很難創作出那種有著一以貫之的氣概和個性的佳作來。

在作家們內心中，除有受別人羞辱之苦外，還有受自我譴責之苦。他們中許多人都曾迫於壓力寫過所謂「觸及靈魂」的思想檢查，既痛罵自己，又揭發同仁，故使自己成了一個屈服於政治淫威的精神自首者或思想告密者。這些事對於那些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最有損他們的名節，最能使他們的內心隱隱作痛。

此外，一些有影響的名作家，還有擔負社會工作過多的煩惱。一位知識界朋友曾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有一次，老舍先生去看望因被打成「右派」而避居京郊的王瑩。閒聊中，老舍先生竟羨慕起這位落難者來，說她多少還有一個清靜的地方，還有一個外界少有打擾的地方，不像自己擔任許多社會職務，將大量時間耗費在很不合自己性情的官場應酬上。老舍先生所說的官場應酬，無非這樣一些事情：或是上傳下達，說上一些套話；或是迎來送往，陪上一些笑臉；或是讓一個很含蓄的人頻頻張口，高呼充滿革命激情的口號；或是讓一個很有思想的人屢屢舉手，贊成自己並不清楚的事情。不過，執政黨讓老舍先生出來做這些事情，並非惡意，其間雖有為己所用之意，但也有厚待客卿之意。

對於大多數執政黨幹部來說，在官場中擔任一定級別的職務，既是自己獲得上級信任程度的標誌，也是自己獲得個人待遇水平的尺度，因而都比較看重職務、看重級別，品評人物少不了要談一下該同志在這方面的情況。即便在日常交談中，他們一說到自己有什麼樣的級別和享受什麼樣的待遇、以及他人有什麼樣的級別和享受什麼樣的待遇時，就立刻興致勃勃起來，眼睛也顯得更亮些。

不僅如此，他們還能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以為別人也像他們那樣考慮問題，於是給他們較看重的一些社會賢達也安個什麼職務，或為某某委員或為某某長，以示垂愛。他們此舉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謂大恩大德，感激都來不及；但對於像老舍這種以寫作為生命的人來說，則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政

府還信得過自己，憂的是自己將很難靜下心來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就舍公本心而言，最想做的是不會是當官，而是寫作，不會是要以官位顯於世，而是要以文名傳於世。事實也是如此，今天沒有多少人知道老舍先生當過什麼官，但也沒有多少人不知道老舍先生寫過《駱駝祥子》。

這種由執政者向清純學人授以官職的做法，有些類似貓兒想送兔兒可口食物，結果送了小魚兒。顯然，貓兒是出於好意的，是想與兔兒共享好事的，可問題是兔兒接受不了貓兒這番好意。小魚兒在這一方是美味佳餚，在那一方則難以下咽。

誠然，也有兔兒漸漸愛上了貓食毋寧說兔兒漸漸變成了貓兒的情況。有那麼一些步入官場的學者文人，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坐穩了官位，嘗到了甜頭，並且樂此不疲，一坐就坐到了一大把年紀還不想下來，還美其名曰：亦學亦官，亦雅亦俗。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亦此亦彼的人，再也做不了一流的學問，再也寫不出一流的佳作。

老舍先生善解人意，拉不下臉來拒絕執政者的好意，故而做了人家的應酬官；可老舍先生酷愛寫作，打心底裡不喜歡官場上的事情，於是有了他在王瑩面前發的那一通牢騷話。

總之，中共黨人以其自身在建國前所承受的苦難和在建國後所製造的苦難，為新中國文化藝術界提供了最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中共黨人及其治下百姓，未能看到最上乘的文化產品。

這對於那些犧牲於苦難的人——無論是長眠於雪山草地的紅軍戰士，還是長眠於勞改農場的知識分子——來說，是非常遺憾的。這對於那些活過了苦難的人——無論是革命戰爭中的倖存者，還是政治運動中的倖存者——來說，是非常尷尬的。不過，最尷尬者，不是別人，而是最高執政者本人。因為，正是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的文化藝術界，既創製不出反映前一苦難的文化精品，也創製不出反映後一苦難的文化精品。前者是他本應該做成卻沒有做成的事，後者是他既不想做成也無法做成的事。

毛澤東尤為尷尬的是，他自以為提出了一條十分正確的文藝路線，他也

清楚在這條十分正確的文藝路線下卻未能產生十分輝煌的文化成就。

可是，毛澤東並沒有因尷尬而自責、而自慚形穢，反倒是由尷尬而惱怒、而遷怒他人，憤憤然抱怨文化藝術界拿不出新作品來，總在那裡炒剩飯、「推陳出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中國死人，外國死人」。

問題在於，他除了抱怨失敗外，還應該抱怨失敗的原因，抱怨造成這一局面的真正責任者。抱怨者最應該被抱怨。

文化叢刊

毛澤東執政春秋

2001年12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380元

著者 單少傑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張怡菁

校對 陳怡君

封面設計 在地研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21-6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